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九十一本，第二分

出版日期：民國一〇九年六月

西州回鶻統治者稱號研究 ——年代、結構與特徵

付馬*

西元九世紀中葉，西遷至東部天山地區的回鶻民眾建立起以西州、北庭為中心的西州回鶻政權。囿於傳世史料失載，西州回鶻的歷史至今撲朔迷離，其統治者的事蹟僅有片斷資訊殘留史冊。本文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充分發掘上個世紀以來吐魯番等地出土的古突厥語、中古伊朗語文字材料，結合漢文、伊斯蘭傳世史料和考古資料，勾稽西州回鶻統治者的稱號，並對這些材料逐條甄辨，討論其性質及年代。在此基礎上，本文將建立西州回鶻統治者的年代體系，歸納其正式稱號的結構特徵，總結其中一些因素的流變過程。西州回鶻統治者的稱號繼承了漠北回鶻汗國時代的部分傳統，又增加了新的因素和結構特徵。隨著佛教取代摩尼教成為西州回鶻的國教，稱號中的摩尼教因素雖然保留，但其含義已發生變化。

關鍵詞：西州回鶻 可汗 統治者稱號

*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

本文係中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唐元之間絲綢之路天山廊道的轉型與發展研究」（項目編號：18CZS074）的階段性成果。

一・問題的提出與先行研究

回鶻在北魏始以「袁紇」之名見於史冊，時為遊牧在漠北草原的鐵勒諸部之一。¹ 八世紀中葉，回鶻部崛起為漠北遊牧諸部中的最強者，建立起龐大的遊牧帝國——漠北回鶻汗國。八四〇年，回鶻汗國在天災人禍中崩潰，餘部四散奔逃。後來西遷至東部天山和河西地區的回鶻部眾先後建立起西州回鶻和甘州回鶻政權。甘州回鶻在十一世紀為西夏所滅。西州回鶻政權則存續數百年之久；其間，它雖曾先後向遼、宋、西遼等政權稱臣，卻一直保持事實上的獨立。一二〇九年，西州回鶻歸順新興的蒙古汗國，其地被納入蒙古汗國的版圖。

統治者稱號是傳統史學中最為重要的題目之一。漠北回鶻可汗世系² 和蒙元時代畏兀兒亦都護世系³ 目前已經大體清楚，僅局部存疑。甘州回鶻大部分統治者的事蹟散見於漢文史籍中，學者已藉此部分地重構了其統治者的世系。⁴ 而西州回鶻統治者的事蹟大都不見於傳世史料的記載。一直以來，西州統治者的稱號和世系

¹ 回鶻 (Uighur) 在不同時代的漢文語境中有不同的名稱。在北朝稱「袁紇」，隋代稱「韋紇」，後改稱「回紇」。唐代先稱「回紇」，後改稱「回鶻」。在元代漢文史料中，回鶻多被稱為畏兀兒；而「回鶻」一詞則頗有歧意，反而多指穆斯林。本文行文中除引用原始文獻外，對元代以前的敘述通用「回鶻」；對元代的敘述則用「畏兀兒」。

² 漠北回鶻可汗稱號可從漢文傳世史料、西奈烏蘇碑和九姓回鶻可汗碑中勾稽。山田信夫最早系統解決漠北回鶻可汗世系問題，參看山田信夫，〈九姓回鶻可汗の系譜：漠北時代ウイグル史覺書〉，《東洋學報》33.3/4(1951)：90-113。森安孝夫以此研究為基礎，補以後出的研究成果，列有漠北回鶻可汗世系表，參看森安孝夫 (T. Moriyasu)，〈ウイグル＝マニ教史の研究〉，《大阪大學文學部紀要》31/32(1991)：182-183；德譯本：*Die Geschichte des Uigurischen Manichäismus an der Seidenstraße* (Wiesbaden, 2004), pp. 221-222.

³ 蒙元時代畏兀兒亦都護世系可以《亦都護高昌王世勳碑》為綱，輔以其他史料進行重構。最早有程溯洛先生的復原，參看程溯洛，〈高昌回鶻王國亦都護譜系考——西域時代回鶻史劄記〉，氏著，《唐宋回鶻史論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頁 205-222。其後，有党寶海的論文及文後附「13、14世紀畏兀兒亦都護世系圖」，參看氏著，〈13、14世紀畏兀兒亦都護世系考〉，《西北民族研究》1998.1：27-35。海外學者的最新研究有芮跋辭 (V. Rybatzki) 據《世勳碑》、蒙漢雙璧《西寧王忻都公神道碑》、蒙文、回鶻文書復原出十三世紀以降仕元朝的畏兀兒亦都護和察合台汗國所另立高昌亦都護兩支的譜系，參看 V. Rybatzki, “Türk and Uigur rulers in the Old Turkic inscriptions,”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44.2 (2000): 253-255.

⁴ 參看J. R. Hamilton, *Les ouighours à l'époque des Cinq Dynasties* (Paris, 1955), pp. 143-144；林幹，〈河西回鶻可汗世系表〉，氏著，《突厥與回紇史》（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頁241。

都是西州回鶻歷史中充滿爭議又令人生畏的題目。從二十世紀初葉以來，新疆、甘肅等地不斷出土由各種語文書寫的文字材料，其中一些正屬於西州回鶻時代。隨著這些文字材料被陸續刊佈、解讀，一些回鶻統治者的稱號和事蹟又浮出水面。哈密屯 (J. R. Hamilton) 最早將出土文書中所見的西州回鶻可汗與漢文史料的記載相結合，嘗試構建西州回鶻統治者的年代體系。⁵ 森安孝夫討論了出土文書中出現的可以確定年代的六個回鶻可汗稱號，建立起目前學者利用最多的西州回鶻統治者年代體系，為後來的研究提供了基礎。⁶ 茨默 (P. Zieme) 在森安孝夫研究的基礎上，討論了古突厥語和中古伊朗語摩尼教文書中出現的七個回鶻統治者稱號，比定出其中六位屬於西州回鶻時代。⁷ 宗德曼 (W. Sundermann) 又在茨默研究的基礎上，補充討論了中古伊朗語文書中出現的幾個西州回鶻統治者稱號。⁸ 二〇〇〇年，芮跋辭 (V. Rybatzki) 全面討論了突厥汗國和漠北回鶻汗國的統治者稱號，並在此框架內討論了七個西州回鶻統治者稱號。⁹ 榮新江先生以森安孝夫的研究為基礎，參考茨默、宗德曼的研究，將新發現的一個回鶻可汗號置於西州回鶻統治者的年代框架中。¹⁰ 通過上述學者的努力，我們有了全面研究這一問題的基礎。隨著相關出土文書的系統刊布，對這一問題的討論有可能更加充分和深入。本文擬在諸位先學研究的基礎上，逐一討論各種文字資料和考古資料中所見的西州回鶻統治者稱號，探討這些稱號的性質，判斷其年代。在此基礎上，筆者嘗試構建一個更為豐富的西州回鶻統治者的年代體系，歸納出其稱號的結構特徵，總結其中重要因素的流變規律。

⁵ Hamilton, *Les ouighours à l'époque des Cinq Dynasties*, pp. 142-143.

⁶ 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マニ教史の研究〉，頁 182-185；*Die Geschichte des Uigurischen Manichäismus an der Seidenstraße*, pp. 221-225.

⁷ P. Zieme, “Manichäische Kolophone und Könige,” in *Studia Manichaica,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ichaeism, St. Augustin/ Bonn, August 6-10, 1989*, ed. G. Wiessner and H.-J. Klimkeit (Wiesbaden, 1992), pp. 323-327.

⁸ W. Sundermann, “Iranian Manichaean Turfan Texts concerning the Turfan Region,” in *Turfan and Tun-huang the texts*, ed. A. Cadonna (Firenze, 1992), pp. 63-84.

⁹ Rybatzki, “Türk and Uigur rulers in the Old Turkic inscriptions,” pp. 205-292.

¹⁰ 榮新江，〈《西州回鶻某年造佛塔功德記》小考〉，張定京、阿不都熱西提·亞庫甫編，《突厥語文學研究——耿世民教授 80 華誕紀念文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9），頁 182-190。

二・各種資料所見西州回鶻統治者稱號的定性與定年

筆者將搜集漢文、回鶻文和摩尼文中古伊朗語文獻、文書中出現的西州回鶻統治者稱號、事蹟，依次展開討論，力求比定出這些統治者的年代，復原西州回鶻可汗世系（前面加 * 號者為復原之名稱）。

(1) 僕固俊=Udan boquγ=僕固天王=*Boyuq kün/kül/kür täŋri elig (-866-876-)

八六六年，僕固俊從北庭崛起，奪取西州，建立西州回鶻王國。其事蹟見於漢文正史的記載中。筆者曾利用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BD11287 號敦煌文書論證僕固俊勢力在其後不久即遭受重創，勢力範圍可能僅剩西州一地。¹¹ 榮新江先生在法藏 Pelliot chinois 5007 號敦煌文書中檢出「僕固天王打破伊州」，指出八七六年僕固俊率領西州回鶻向東攻克伊州。¹² 波斯語歷史地理著作《記述的裝飾》(Zayn al-Akhbār) 記有托古茲古思 (Toghzughuz) 開國之君菊兒特勤 (Kür Tegin) 的傳說，¹³ 森安孝夫最早將此傳說與僕固俊取代龐特勤建立西州回鶻政權的史事聯繫起來，認為菊兒特勤的原型正是僕固俊。¹⁴ 筆者曾考證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藏 xj 222-0661.09 回鶻文書中所記的兀單 (Udan) 汗的事蹟原型即為僕固俊開國之事，並指出西州回鶻及後來元代畏兀兒人的歷史記憶兀單卜古 (Udan Boquy) 汗的傳說是層累地創造出來的，僕固俊開國事蹟就是其中一源。¹⁵ 因此，筆者推測卜古汗之名“Boquγ”可能與「僕固」有關。

¹¹ 付馬，〈唐咸通乾符年間的西州回鶻政權——國圖藏 BD11287 號敦煌文書研究〉，《敦煌研究》2014.2：76-81。

¹² 榮新江，〈歸義軍及其與周邊民族的關係初探〉，《敦煌學輯刊》1986.2：33；榮新江、余欣，〈沙州歸義軍史事繫年（咸通十四年—中和四年）〉，南華大學敦煌學研究中心編，《敦煌學》第 27 輯（臺北：樂學書局，2008），頁 259。

¹³ A. Martinez, “Gardīzī’s Two Chapters on the Turks,”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2 (1982): 133.

¹⁴ 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の西遷について〉，《東洋學報》59.1/2 (1977): 113-118，後收入氏著，《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社，2015），頁 282-286。

¹⁵ 參看付馬，〈西州回鶻王國建立初期的對外擴張——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藏 xj222-0661.09 號回鶻文書的歷史學研究〉，朱玉麒主編，《西域文史》第 8 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3），頁 148-151。

(2) 回鶻愛登曷哩阿那骨牟里彌施俱錄闕蜜伽□□聖〔天〕可汗 = *Uyyur ay täjridä [...] qut bulmïš külüg köl bilgä [...] iduq täjri xayan (933 年以前)

吐魯番吐峪溝曾出土一件回鶻統治時代以漢文書寫的《造塔功德記》，¹⁶ 記有當時可汗的稱號，作：「回鶻愛登曷哩阿那骨牟里彌施俱錄闕蜜伽□□聖〔天〕可汗。」榮新江先生將其復原為古突厥語，作：“*Uyyur ay täjridä [...] qut bulmïš külüg köl bilgä [...] täjri xayan”，推測此可汗在位的年代為九世紀末或十世紀上半葉。¹⁷ 據 xj 222-0661.09 回鶻文書可知，漢文「聖天」二字對應的回鶻文為“iduq täjri”，¹⁸ 則此稱號可進一步復原作：“*Uyyur ay täjridä [...] qut bulmïš külüg köl bilgä [...] iduq täjri xayan”。筆者贊同榮先生對其年代範圍的判斷，並再補充一點證據。西州回鶻入貢遼朝始於遼太祖元年（907）。《遼史·屬國表》記：「太祖元年十二月，和州回鶻來貢。」¹⁹ 這裡稱西州回鶻為「和州回鶻」（Qočo Uyyur）。《遼史·太祖本紀》又記：太祖七年（913）「冬十月庚午，駐赤崖。戊寅，和州回鶻來貢」。²⁰ 知西州回鶻最初是以「和州回鶻」之名出現在《遼史》的記載中。自太宗朝始，一支名為「阿薩蘭」（Arslan）的回鶻開始入貢遼朝。《遼史·太宗本紀》記：天顯八年（933）「六月甲子，回鶻阿薩蘭來貢」。²¹ 從此以後，阿薩蘭回鶻（回鶻阿薩蘭）之名頻繁出現，而和州回鶻、高昌回鶻之名僅在十一世紀之後偶有出現。這支阿薩蘭回鶻實際正是西州回鶻，《遼史》以其統治者稱號中出現的“arslan”來指稱該政權。華濤先生對此問題已有精闢論證。²² 筆者推測，正是在十世紀前半葉，西州

¹⁶ 最早由陳國燦、伊斯拉非爾·玉蘇甫刊佈、全面研究，參看二位〈西州回鶻時期漢文《造佛塔記》初探〉，《歷史研究》2009.1：174-182；榮新江重新研究了文書，對二人的解說提出多處修正和補充，參看氏著，〈《西州回鶻某年造佛塔功德記》小考〉，頁 182-190。本文引用文書錄文取自榮先生論文。

¹⁷ 榮新江，〈《西州回鶻某年造佛塔功德記》小考〉，頁 186。

¹⁸ Zhang Tieshan and P. Zieme, “A Memorandum About the King of the On Uyghur and his Realm,”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64.2 (2011): 132.

¹⁹ 脫脫等，《遼史》（北京：中華書局，2016，點校本修訂本），卷七〇，頁 1241。

²⁰ 脫脫等，《遼史》卷一，頁 8。

²¹ 脫脫等，《遼史》卷三，頁 37。

²² 華濤，《西域歷史研究——八至十世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頁 95-100。此觀點近年已受到治中世紀中亞史學者的普遍支持，參看 Liu Yingsheng, “A Century of Chinese Research on Islamic Central Asian History in Retrospect,” in “Études karakhanides,” special issue, *Cahiers d'Asie centrale* 9 (2001): 121; M. Biran, “Unearthing the Liao Dynasty's Relations with the Muslim World: Migrations, Diplomacy, Commerce and Mutual Perceptions,” *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 43 (2013): 223-224.

付馬

回鶻統治者開始在其稱號中加入「阿薩蘭」(arslan) 這一因素，並形成傳統。可汗號(2)應當是一個正式的全稱，其中不見有阿薩蘭 (arslan)，則這位可汗的年代應當在九三三年之前。

(3) Törtünč el bilgä täŋri elig= *第四國毗伽天王 (-954-)

(4) Törtünč arslan bilgä täŋri elig sünjülüg xayan= *第四阿薩蘭毗伽天王孫骨祿可汗=西州外生師子王阿斯蘭漢 (-981-984-)

此兩可汗號出現在德藏 M 112 文書背面。文書正面為摩尼文粟特語書信，由中亞的摩尼僧寫給高昌的摩尼高僧，講述八世紀發生在西亞教區的兩派鬥爭波及東方教區之事，當寫成於九世紀，由宗德曼釋讀。²³ 文書背面則是著名的回鶻文摩尼教寺院被毀文書，由耿世民先生與克林凱特 (H.-J. Klimkeit) 刊佈。²⁴ 森安孝夫其後也發表他的讀本，並考證文書年代。²⁵ 背面第 9 行和第 12-13 行出現兩處紀年 (I、II)，分別作：²⁶

I. törtünč el bilgä täŋri elig uyrıntıta qap bars yılın

「在第四國毗伽天王治下，甲寅年」

II. kewan payrlıy quu qoyn yılın törtünč arslan bilgä täŋri elig sünjülüg xayannıň
yarlıyıňa

「在土星所在的癸未年，在第四阿薩蘭毗伽天王孫骨祿可汗的令下」

紀年 II 同時使用了干支紀年法(「癸未」)和印度星座紀年法(「土星所在」)，兩相勘合可以確定在西元九八三年。²⁷《宋史·高昌傳》記：「太平興國六年 (981)，其王始稱西州外生師子王阿斯蘭漢，遣都督麥索溫來獻。五月，太宗遣供奉官王延

²³ W. Sundermann, “Probleme der Interpretation manichäisch-sogdischer Briefe,” in *From Hecataeus to al-Huwarizmi: Syriac, Arabic, Chinese, Greek and Latin Sources from the History of Pre-Islamic Central Asia*, ed. J. Harmatta (Budapest, 1984), pp. 289-316.

²⁴ Geng Shimin and H.-J. Klimkeit, “Zerstörung manichäischer Klöster in Turfan,” *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18 (1985): 7-11.

²⁵ 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マニ教史の研究〉，頁 147-151；*Die Geschichte des Uigurischen Manichäismus an der Seidenstraße*, pp. 175-179.

²⁶ 筆者對本文所引古突厥語文句作如下處理：文字未表記之元音全部按完整形式補全；構型、構詞附加成分與詞幹分開書寫者全部連寫；齒音混同字符按正字轉寫。

²⁷ 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マニ教史の研究〉，頁 149-150；*Die Geschichte des Uigurischen Manichäismus an der Seidenstraße*, p. 177.

德、殿前承旨白勳使高昌……七年四月至高昌……師子王邀延德至其北廷……八年春，〔延德〕與其謝恩使凡百餘人復循舊路而還……雍熙元年四月至京師。」²⁸ 可知，在九八一至八四年間，西州回鶻應當沒有發生王位更迭。文書中的「第四阿薩蘭毗伽天王孫骨祿可汗」正是王延德在九八二年所見的「西州外生師子王」。²⁹

紀年 I 僅使用干支紀年「甲寅」。但文書作者同時經歷 I、II 兩個年代，兩紀年間應相差一代人以內，則此「甲寅」年應為九五四年。

(5) Bögü bilgä täŋri elig=祿勝=*Bögü arslan bilgä täŋri elig qutluy küclüg xayan (996-1003-)

黃文弼先生在吐魯番地區所獲出土文書中有一件回鶻文曆日文書，文書第 11-12 行寫有包含回鶻統治者稱號的紀年。³⁰ 茨默最早注意到這件文書，在其提示下，哈密屯研究了這條紀年，讀作：³¹

bešinč altun qutluy kuii tavışyan yılqa liryžir bögü bilgä täŋri elig sanī sākiz

「第五行金位癸卯年曆日 (liryžir)。牟羽毗伽天王的〔年〕數第八」

哈密屯將此癸卯年比定為西元一〇〇三年，已被學界普遍接受。³² 則此可汗登基的年份在九九六年。《遼史·聖宗本紀》記：統和十四年 (996) 十一月，「阿薩蘭回鶻遣使為子求婚，不許」。³³ 哈密屯最先指出，這次遣使的阿薩蘭回鶻可汗正是本文書所記這位「天王」。³⁴ 森安孝夫進一步將其與宋真宗咸平四年 (1001)

²⁸ 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點校本），卷四九〇，頁 14110-14113。

²⁹ 森安孝夫最早指出此點，參看氏著，〈ウイグル=マニ教史の研究〉，頁 183-184；*Die Geschichte des Uigurischen Manichäismus an der Seidenstraße*, pp. 222-223.

³⁰ 文書圖片參看黃文弼，《吐魯番考古記》（北京：中國科學院，1954），圖版 96、圖 88(2)，頁 102。

³¹ J. R. Hamilton, *Manuscrits ouïgours du IX^e-X^e siècle de Touen-Houang* (Paris, 1986), p. xvii, n. 28; J. R. Hamilton, “Calendriers manichéens ouïgours de 988, 989, et 1003,” in *Mélanges offerts à Louis Bazin par ses disciples, collègues et amis*, ed. J.-L. Bacqué-Grammont et R. Dor (Paris, 1992), p. 9.

³² 參看吉田豐，〈ソグド雜錄（II）〉，《オリエント》31.2(1989)：165-168；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マニ教史の研究〉，頁 183-184；*Die Geschichte des Uigurischen Manichäismus an der Seidenstraße*, p. 223; Hamilton, “Calendriers manichéens ouïgours de 988, 989, et 1003,” pp. 8-9.

³³ 脫脫等，《遼史》卷一三，頁 160。

³⁴ Hamilton, *Manuscrits ouïgours du IX^e-X^e siècle de Touen-Houang*, p. xvii, n. 28.

付馬

遣使朝宋的「大回鶻龜茲國安西州大都督府單于軍克韓王祿勝」勘同。³⁵「克韓」即可汗 (xayan)，可知此王戴有可汗之頭銜。漢文史料記其名為「祿勝」，這應是其稱號中的標誌性因素。見於宋代史料中的回鶻統治者稱號多為漢文意譯，譬如：「師（獅）子王」(arslan xan)、「智海」(köl bilgä) 等。筆者據此推測，「祿勝」也可能是意譯，或為突厥語 “qutluγ küchlüg”。則該回鶻可汗的正式稱號可復原為 “*Bögü arslan bilgä täjri elig qutluγ küchlüg xayan”。

(6) Köl bilgä täjri elig (1007-1008-)

二十世紀初葉，德國吐魯番探險隊在吐魯番地區獲得三件表面寫有文字的八面體圓錐型木柱，係西州回鶻佛教信眾出資修造寺院時所製刻木，現藏於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第一木柱 (MIK III 4672) 文書以半楷體回鶻文書寫，前 3 行保留當時可汗的稱號和紀年，作：³⁶

yemä qutadmış qutluγ topraq qutluγ bečin yılqa ödrülmış ädgü ödkä qutluγ qoluqa
toquzunč ay tört otuzqa purvapulguni yultuzqa kün ay täjri täg küsänčig körtlä
yaruq täjri bögü täjrikänimiz köl bilgä täjri eligniγ orunqa olurmış ekinti
yiliŋa...

現在，在有福的土位的 (topraq qutluγ) 申年，在良辰吉時，在九月廿四日，在前德宿 (Pūrva Phālgunī) 之時，我們像日神、月神一般莊嚴的、光明、神聖、幻化無窮的聖天〔可汗〕——闕毗伽（智海）天王登基的第二年……

文書所記「申年」被學者定在一〇〇八年。對於文書所記的可汗稱號 “Kün ay täjri täg küsänčig körtlä yaruq täjri bögü täjrikänimiz köl bilgä täjri elig”，學者有不同解讀。此句顯然應當從複數第一人稱領屬附加成分 “-imiz”（我們的）處斷開，分為前後兩個部分，這點已經廣為學界接受。許多學者將後半部分 “köl bilgä täjri elig” 解為前代可汗的稱號，而將前半部分 “kün ay täjri täg küsänčig körtlä yaruq täjri bögü täjrikän” 解為當時的可汗的稱號，則兩部分整體解作：「〔本朝的〕kün ay täjri täg küsänčig körtlä yaruq täjri bögü täjrikän 繼承〔前朝的〕köl bilgä täjri elig

³⁵ 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マニ教史の研究〉，頁 183-184；*Die Geschichte des Uigurischen Manichäismus an der Seidenstraße*, p. 223.

³⁶ T. Moriyasu, “Uighur Buddhist Stake Inscriptions from Turfan,” *De Dunhuang à Istanbul—Hommage à James Russell Hamilton* (Brepols, 2001), p. 161；森安孝夫，〈西ウイグル王國史の根本史料としての棒杭文書〉，氏著，《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頁 690。

的王位後的第二年。」這種讀法已受到森安孝夫有力地批評。³⁷

森安孝夫認為，前半部分 *kün ay täjri täg küsänçig körtlä yaruq täjri bögü täjrikän* 是可汗的具體稱號，後半部分 *köl bilgä täjri elig* 則是西州回鶻可汗的統稱。³⁸ 而筆者的看法則與其相反：前半部分應當是極盡讚美的修飾性稱謂，後半部分 *köl bilgä täjri elig* 是這位可汗的簡稱或俗稱。首先，森安稱 *köl bilgä täjri elig* 是西州回鶻可汗的統稱，理由並不充分。從本文所枚舉的西州回鶻可汗稱號看，毗伽（*bilgä*，「智」）確是可汗號常見的構成成分，但卻並非一定與 *köl* 連用；它也經常單獨出現，或與 *uluy* 連用。況且，常見的可汗號構成成分也遠非 *bilgä* 一個，上文討論過的 *arslan* 就是一例。第二，遍覽漠北回鶻汗國和西州回鶻王國可以確定為正式稱號的可汗號，都不見有“*kün ay täjri täg*”（像日神、月神一樣）和“*küsänçig körtlä*”（如期的、好看的）這樣的因素。這些因素應當是修飾、溢美之詞，而非固定稱號。在摩尼教文獻中，回鶻摩尼教徒就常以 *küsänçig körtlä* 修飾摩尼。³⁹ 因此，第一木柱上出現的這一整串頭銜“*kün ay täjri täg küsänçig körtlä yaruq täjri bögü täjrikänimiz köl bilgä täjri elig*” 應當譯作「我們像日神、月神一般莊嚴的、光明、神聖、幻化無窮的聖天〔可汗〕——闢毗伽（智海）天王」。

(7) *Kün ay täjridä qut bulmïš uluy qut ornanmïš alpïn ärdämin el tutmïš alp arslan qutluq köl bilgä täjri elig on uyyur xan* (1007-1008-1021-1024-) =
(6)

德藏第三木柱 (MIK III 7279) 文書前 3 行記有當時可汗的稱號和紀年，作：⁴⁰
qutluq ki ot qutluq qoyn yıl ekinti ay üç yañïqa: kün ay täjridä qut bulmïš uluy qut ornanmïš alpïn ärdämin el tutmïš alp arslan qutluq köl bilgä täjri elig on uyyur xan [...]MYŞ öjtün şaciu kedin uc barsxanqatagi ellänü ärksinü yarlıqayur uýurda... 在有福的火位的 (ot qutluq) 己 (ki) 未年二月初三，君愛登里羅汨末密施胡祿汨幹那密施合奮愛登密頓咄登密施合阿薩蘭骨咄祿闢毗伽登里頓利十姓回鶻汗 (kün ay täjridä qut bulmïš uluy qut ornanmïš alpïn ärdämin el tutmïš alp

³⁷ Moriyasu, “Uighur Buddhist Stake Inscriptions from Turfan,” pp. 164-165.

³⁸ 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マニ教史の研究〉，頁 184-185；*Die Geschichte des Uigurischen Manichäismus an der Seidenstraße*, pp. 223-225.

³⁹ 參看楊富學，〈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回鶻米副侯墓誌》考釋〉，《民族研究》2015.2 : 82。

⁴⁰ 森安孝夫，〈西ウイグル王國史の根本史料としての棒杭文書〉，氏著，《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頁 694-695。

付馬

arslan qutluy köl bilgä täjri elig on uyyur xan) ……統治東到沙州、西到烏什、拔塞幹之時……

據文書所記干支、五行紀年，其年代可被定在西元一〇一九年。可汗的稱號“kün ay täjridä qut bulmïš uluγ qut ornamïš alpïn ärdämin el tutmïš alp arslan qutluy köl bilgä täjri elig on uyyur xan”與漠北回鶻可汗的正式稱號的結構一致，是這位可汗的正式稱號。⁴¹ 哈密屯和森安孝夫都將這位可汗與漢文史料中所記北宋天禧四年（1020）十二月入宋朝朝貢的龜茲回鶻可汗師子王智海勘同。從年代和其稱號中“arslan”、“köl bilgä”等因素看，其說無誤。哈密屯提出，出現在第一木柱銘文中的稱號（6）就是這位可汗的簡稱，兩者應為一人。⁴² 其說甚是。

《突厥語大詞典》記載，回鶻的汗被稱為闕毗伽汗（köl bilgä xan），意為「他的智慧像湖（海）一樣」。⁴³ 森安孝夫據此提出，「闕毗伽汗」是西州回鶻可汗的泛稱，應出現在每位可汗的正式稱號中。如前所述，在現存西州回鶻可汗的其他稱號中並不都含有“köl bilgä”這一因素，說明這並非西州回鶻可汗的泛稱。筆者認為，這應是《突厥語大詞典》作者喀什噶里生活時代最為著名的一位西州回鶻可汗的稱號，即稱號（6）、（7）所指的那位可汗，亦即漢文史料所記龜茲回鶻「可汗師子王智海」。

筆者先分析當時西域地區的政治形勢。十世紀中葉以來，西部天山地區的突厥人逐漸統一在喀喇汗王朝麾下，並開始伊斯蘭化。十世紀末，喀喇汗王朝聯手伽色尼王朝攻滅薩曼波斯王朝，勢力深入河中地區。十一世紀初，他們又攻滅于闐王國，將勢力從喀什一帶推進到絲路南道的于闐一帶。十一世紀初葉，喀喇汗王朝的主要對手就是西州回鶻。雖然有關雙方作戰的確切記載並未留下，但我們從史料中仍能找到蛛絲馬跡。有關喀喇汗王朝和西州回鶻的歷史記載中，一些相同時間點上的巧合引人注意。

1. 十、十一世紀之交正是喀喇汗王朝對外擴張的盛期，其先後攻滅薩曼王朝和于闐佛國，兵鋒極盛。另一方面，從一〇〇一年起漢籍中出現「龜茲回鶻」之名。在其後的半個多世紀中，入貢宋朝的西州回鶻使者多稱「龜茲回鶻」。關於

⁴¹ 關於回鶻可汗正式稱號的結構，詳見本文第三節的討論。

⁴² Hamilton, *Manuscrits ouïgours du IX^e-X^e siècle de Touen-Houang*, pp. xvii-xviii.

⁴³ Mahmud al-Kaşyari,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vol. 1, ed. and trans. R. Dankoff (Harvard University printing house, 1982), p. 324.

龜茲回鶻，前人多有討論。前引第三木柱銘文記西州回鶻汗的「統治東到沙州、西到烏什、拔塞幹」，這已然表明：東部天山地區的回鶻人在十一世紀初葉統一在同一個政權之下。所謂「西州、龜茲雙王」說⁴⁴ 等觀點已不攻自破。根據《宋史》記載，這個政權「或稱西州回鶻，或稱西州龜茲，又稱龜茲回鶻」。⁴⁵ 那麼，為何西州回鶻在十一世紀初又有了「龜茲回鶻」這個名稱呢？筆者認為，這與當時的戰爭形勢有關——西州回鶻可汗出鎮龜茲與喀喇汗王朝作戰。伊本·阿西爾 (Ali ibn al-Athir) 所撰《全史》(*al-Kāmil fit-Tārīkh*) 記載，回曆四〇八年 (1017/1018)，「大批突厥人……從中國〔向外〕侵略，其中有〔後來〕統治河外之地的契丹人。……突厥人外侵的原因是：托幹汗統治突厥斯坦時，得了重病，病了很長時間，於是他們（突厥人）垂涎那個地區，來到那裡，統治了一部分地區，掠物抓人，他們距巴拉沙袞為 8 日程」。⁴⁶ 華濤認為，這批入侵者是被遼朝逐出故地的阻卜部落。⁴⁷ 據《突厥語大詞典》記載，到十一世紀中葉時，韃靼人 (Tatar，即阻卜) 已被看作是突厥人的一部。⁴⁸ 但華氏的比定仍然存在一個問題。文獻記載與突厥人一同入侵的還有契丹人，則這批突厥人與契丹人應是盟友。這與遼朝和阻卜之間的關係並不吻合。考慮到喀喇汗王朝與西州回鶻的對峙形勢，筆者認為這批從「中國」入侵喀喇汗王朝的突厥人應當就是分佈在東部天山地區的西州回鶻及其治下的突厥語族部落。他們曾趁機逼近河中地區。西州回鶻聯結契丹劫掠喀喇汗王朝的情況完全可能發生。遼朝建立以來，西州回鶻就向其稱臣，並一直保持密切的聯繫。⁴⁹《遼史·興宗本紀》記：重熙二十二年 (1053)「二月丙子，回鶻阿薩蘭為鄰國所侵，遣使求援」。⁵⁰ 可見西州回鶻在軍事安全方面對契丹的依賴。或許因為西州回鶻的關係，遼朝對喀喇汗王朝並不友善。北宋熙寧六年 (1073)，喀喇汗王朝治下于闐使者入宋朝貢方物。宋神宗問「『道由諸國，有無抄掠？』曰：『惟懼契丹耳。』」⁵¹ 元

⁴⁴ 程溯洛，〈《宋史·龜茲傳》補正——兼論高昌回鶻王國中的雙王制〉，氏著，《唐宋回鶻史論集》，頁 226-228。

⁴⁵ 脫脫等，《宋史》卷四九〇，《龜茲傳》，頁 14123。

⁴⁶ 轉引自華濤，《西域歷史研究》，頁 97-98。

⁴⁷ 華濤，《西域歷史研究》，頁 98。

⁴⁸ al-Kašyari,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vol. 1, p. 312.

⁴⁹ 參看華濤，〈高昌回鶻與契丹的交往〉，《西域研究》2000.1：23-32。

⁵⁰ 脫脫等，《遼史》卷二〇，頁 280。

⁵¹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1957，影印本），〈蕃夷四之一七〉，頁 7722。

付馬

豐四年（1081），于闐國入貢宋朝的使者阿辛（Äsän）也向北宋皇帝報告：「惟懼契丹鈔掠耳」。⁵²

2. 據第三木柱文書記載，西州回鶻可汗在一〇一九年時向西可以控制到烏什和拔塞幹。而在此前的一〇一六年，喀喇汗王朝卡迪爾汗玉素甫（Qadır Xan Yusuf）在烏什鑄造自己的錢幣。⁵³ 這顯示，正是在一〇一六至一九年之間，西州回鶻從喀喇汗王朝手中奪下了烏什。到一〇一九年，西州回鶻與喀喇汗王朝的前線正在龜茲以西的烏什和拔塞幹一線，雙方可能有激烈爭奪。

3.《突厥語大詞典》「曲先」（Küsän）條記：「曲先，苦叉（Quča）城之（別）名。是回鶻人的邊界。」⁵⁴ 這說明龜茲是回鶻的西邊疆界。而同書「輪台」（Bögür）條卻記：「輪台，在山頂的戍堡，地在苦叉和回鶻之間」，⁵⁵ 說明當時龜茲不在西州回鶻治下。再看同書所附圓形地圖，⁵⁶ 龜茲、末蠻（Barman=阿克蘇）、烏什、拔塞幹全都在「回鶻國」之外。書中對於龜茲地位的界定頗有相互抵牾之處，很有可能當時西州回鶻和喀喇汗王朝之間爭奪的焦點就在龜茲一帶。或許在《突厥語大詞典》成書之際，雙方曾在此地展開激烈的爭奪。

綜合以上三點可知，十一世紀二〇年代以後，喀喇汗王朝與西州回鶻的邊界逐漸從烏什向阿克蘇、再向庫車推進。《遼史》所記興宗重熙二十二年入侵西州回鶻的勢力應當就是喀喇汗王朝。我們可以據此勾勒出十一世紀西域政治形勢的發展過程。約一〇〇六年，喀喇汗王朝攻滅于闐王國，在塔里木盆地的西、南部建立統治。烏什、末蠻等地成為雙方爭奪的焦點。一〇一九年，雙方的前線尚在烏什、拔塞幹一線。到十一世紀七〇年代《突厥語大詞典》成書之時，雙方的前線已經向東推進到龜茲一帶，反映了雙方在天山南道角逐的過程。在雙方對陣初期，西州回鶻的勢力一度非常強盛。《宋會要》記載：「咸平四年（1001）二月，大回鶻龜茲國安西州大都督府單于軍克韓王祿勝遣使曹萬通……萬通自言任本國樞密使，本國東至黃河，西至雪山，有小郡數百，甲馬甚精習，願朝廷命使統領，使得縛繼遷惡黨以獻。」⁵⁷ 這是「龜茲回鶻」第一次遣使入貢宋朝。當時喀喇汗王朝剛取河

⁵² 脫脫等，《宋史》卷四九〇，〈于闐傳〉，頁14109。

⁵³ Y. Bregal, *A Historical Atlas of Central Asia* (Brill, 2003), p. 26.

⁵⁴ al-Kašyari,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vol. 1, p. 308.

⁵⁵ al-Kašyari,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vol. 1, p. 279.

⁵⁶ al-Kašyari,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vol. 1, p. 82.

⁵⁷ 徐松，《宋會要輯稿》，〈蕃夷四之一三〉，頁7720。

中、尚未破于闐，而西州回鶻在東部天山地區兵馬強盛。到一〇一九年，西州回鶻在烏什一帶與喀喇汗王朝交戰，兵鋒直逼喀什。但此後戰事的結果似乎一直向有利於喀喇汗王朝的方向發展。但這並不意味著喀喇汗王朝在戰爭中一路高歌猛進。《突厥語大詞典》「回鶻」條對回鶻人的描寫：「此公國由五座城組成，此五城之民乃異教徒中最為悍勇者，是最好的射手。」⁵⁸ 這從側面反映了戰事之艱難。

如何解釋《突厥語大詞典》稱回鶻的汗為「闕毗伽汗」這條記載呢？如前所述，「闕毗伽」（智海）不是西州回鶻可汗的泛稱，而應指一位具體的可汗，即第三木柱文書中出現的可汗，亦即漢文史料中的智海可汗。在其治下，西州回鶻的西部疆界到達烏什、拔塞幹一線，直逼喀什。此時是兩國戰事最激烈之際，這位可汗一定給喀喇汗王朝都城喀什一帶的軍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此後，隨著喀喇汗王朝向東推進，西州回鶻的勢力已經收縮到龜茲以東，不再對喀什構成威脅。喀什一帶的喀喇汗王朝民眾對西州回鶻可汗最真切的認識應當就是智海。當然，智海可汗甚至有可能從一〇〇七年開始持續統治了很久。在十一世紀上半葉，喀喇汗王朝的主要敵手就是這位智海可汗。

綜上，闕毗伽（köl bilgä 智海）不是西州回鶻可汗的泛稱，而是第三木柱文書所記的可汗 kün ay täjridä qut bulmïš uluγ qut ornanmïš alpïn ärdämin el tutmïš alp arslan qutluγ köl bilgä täjri elig on uyyur xan 的簡稱。他就是漢文史料中的可汗師子王智海，亦即第一木柱文書所記的可汗 köl bilgä täjri elig。《突厥語大詞典》所記回鶻「闕毗伽汗」正是特指這位可汗。據《宋會要》記載，智海可汗至少活躍到一〇二四年。⁵⁹

(8) [...]qut ornanmïš alp qutluγ köl bilgä täjri xan

德藏摩尼文中古波斯語寫本 M 158 為摩尼教讚美詩的一頁，文本讚美的對象是一位全稱為 “[...]qut ornanmïš alp qutluγ köl bilgä täjri xan” 的汗。⁶⁰ 茨默據稱號中 “qut ornanmïš” 這一因素，將其與 (7) 智海可汗勘同。⁶¹ 筆者認為，稱號 (7) 核心的、標誌性的因素應當是 “arslan köl bilgä”，而非 “qut ornanmïš”。 “qut

⁵⁸ al-Kašyari,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vol. 1, pp. 139-140.

⁵⁹ 徐松，《宋會要輯稿》，〈蕃夷四之一三〉，頁 7721 記：北宋「仁宗天聖二年（1024）四月，可汗王智海遣使來貢駱駝、馬、玉、乳香」。

⁶⁰ Zieme, "Manichäische Kolophone und Könige," p. 325; Sundermann, "Iranian Manichaean Turfan Texts concerning the Turfan Region," p. 66.

⁶¹ Zieme, "Manichäische Kolophone und Könige," p. 325.

付馬

oranmīš”這一因素在西州回鶻時代已經成為常見於可汗稱號中的修飾成分（詳見下節）。此可汗的稱號殘留部分中沒有“arslan”，因此有可能是九三三年以前在位的可汗。此外，以摩尼文中古波斯語書寫的摩尼教文獻大都產生於十一世紀以前，與智海可汗活躍的年代十一世紀初也不相符。因此，與智海相比，此稱號更有可能與《造塔功德記》所記可汗號（2）*uyγur ay täjridä [...] qut bulmīš külüg köl bilgä [...] iduq täjri xayan 勘同，但兩稱號現存部分仍有明顯差別。目前只能將此稱號暫斷代在九三三年以前。

(9) [...]rii t(ä)g küsänčig körtlä [...]

德藏摩尼文古突厥語文書 T I α x 13 原件在二戰期間丟失，據編號知當為吐魯番高昌故城 α 寺遺址出土。茨默據葛瑪麗 (A. v. Gabain) 的轉寫指出，文書由一位「小選民」撰寫，讚頌一位稱號僅存“[...]rii t(ä)g küsänčig körtlä [...]”的統治者。茨默據“küsänčig körtlä”這一因素將其與第一木柱文書所記稱號（6）聯繫起來，認定其為森安孝夫比定的可汗稱號“Kün ay täjri täg küsänčig körtlä yaruq täjri bögü täjrikän”。⁶² 筆者在前文已經論證，加在稱號前面的“küsänčig körtlä”等字樣只是摩尼教徒在歌頌、讚美可汗或其他高層人物時的修飾詞彙，並非一位可汗稱號中的固定因素。而其後面的空白完全可能是任何一位回鶻可汗的稱號或摩尼光佛。

(10) '[...] qašinčiγ [...]q bögüü [...] täjrikän

德藏摩尼文古突厥語文書 T. M. 176 最早由勒柯克 (A. v. Le Coq) 在《高昌出土突厥摩尼教文獻》第三冊中作第 23 號刊佈。⁶³ 正面 1-4 行提到一個可汗號：“'[...] qašinčiγ [...]q bögüü [...] täjrikän”。⁶⁴ 茨默注意到其中的“qašinčiγ”（有吸引力的）字樣，認為其與“körtlä”（美貌的）意思相近，且罕見於回鶻可汗稱號中，故將此稱號補全為“A[y täjritäg küsänčig] qašinčiγ [körtlä yaru]q bögüü [...] täjrikän”。他據此將此稱號與第一木柱文書所記帶有“küsänčig körtlä”的稱號（6）聯繫起來。⁶⁵ 正是因為“qašinčiγ”根本不見於回鶻可汗的正式稱號中，筆者認為它和“küsänčig”、“körtlä”等因素一樣，是摩尼教徒在歌頌、讚美高層人物時的修飾之辭。則此稱號並非任何一位回鶻可汗的正式稱號。

⁶² Zieme, “Manichäische Kolophone und Könige,” p. 327.

⁶³ A. v. Le Coq, *Türkische Manichaica aus Chotscho*, III (Berlin, 1922), p. 40.

⁶⁴ Le Coq, *Türkische Manichaica aus Chotscho*, III, p. 40.

⁶⁵ Zieme, “Manichäische Kolophone und Könige,” pp. 326-327.

(11) Tänri xan köl bilgä xan

德藏摩尼文中古波斯語 M 43 文書係一頁摩尼教讚美詩，由繆勒 (F. W. K. Müller) 刊佈。⁶⁶ 文書提到一位回鶻統治者 “tänri xan köl bilgä xan”，宗德曼將其定為稱號 (7)，即「智海」。⁶⁷ 此稱號應是某位回鶻可汗的俗稱或簡稱，其標誌性因素是 “köl bilgä”。從這點考慮，宗德曼的比定很有道理。但智海可汗活躍的時代是十一世紀初葉，當時佛教已經成為西州回鶻的主要宗教，而摩尼教則已走向衰亡。這件以摩尼文、中古波斯語寫就的文書更可能是十一世紀以前的產物。

(12) Qutluy elig ay täjridä qut bulmïš qut ornanmïš alp[in ärdämin el t]utmïš[...]

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藏摩尼教細密畫 MIK III 6368 寫有一位回鶻可汗的稱號。文物圖版最早由勒柯克刊佈。⁶⁸ 該可汗稱號作 “qutluy elig ay täjridä qut bulmïš qut ornanmïš alp[in ärdämin el t]utmïš[...]”。⁶⁹ 雖然文字殘損，但是文脈清楚。起首的 “qutluy elig” (有福的國王) 是泛稱，後面則是這位可汗的全稱。勒柯克曾將其斷代在漠北回鶻汗國時代。⁷⁰ 克林凱特注意到 “ay täjridä qut bulmïš” (從月神處獲得福佑) 這一措辭，將其與漠北回鶻汗國時代帶有同樣成分的可汗稱號聯繫起來。⁷¹ 但是通檢漠北時代的可汗號，無一與此號相符者。儘管稱號 (7) 開頭為 “kün ay täjridä qut bulmïš”，茨默還是將此稱號與 (7) 聯繫起來，理由是兩稱號的其他成分高度一致，尤其是都具有 “qut ornanmïš” 這一成分。⁷² 筆者認為，在可汗的正式稱號中，「從月神處得福佑」、「從日神處得福佑」以及「從日神月神處

⁶⁶ F. W. K. Müller, *Handschriften-Reste in Estrangelo-Schrift aus Turfan, Chinesisch-Turkistan, II*, Abhandlungen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Anhang 2 (Berlin, 1904), pp. 78-79.

⁶⁷ Sundermann, “Iranian Manichaean Turfan Texts concerning the Turfan Region,” p. 67.

⁶⁸ A. v. Le Coq, *Die buddhistische Spätantike in Mittelasien, II: Die Manichaeischen Miniaturen* (Berlin, 1923), Tafel 8a, Abbildung. b.

⁶⁹ Le Coq, *Die buddhistische Spätantike in Mittelasien, II: Die Manichaeischen Miniaturen*, p. 58; 參看 Z. Gulácsi, *Manichaean Art in Berlin Collection* (Brepols, 2001), Appendix I, pp. 92, 232。

⁷⁰ Le Coq, *Die buddhistische Spätantike in Mittelasien, II: Die Manichaeischen Miniaturen*, p. 58.

⁷¹ 參看 H.-J. Klimkeit, *Manichaean Art and Calligraphy* (Leiden, 1982), p. 37。克氏在文中稱，七九〇至八三三年間共有四位可汗稱號中帶有 ay täjridä qut bulmïš。但實際只有三位可汗的稱號如此。

⁷² Zieme, “Manichäische Kolophone und Könige,” p. 325.

付馬

得福佑」三種措辭的差別應當重視（詳見後文）。況且這個可汗的稱號後殘，資訊不足。筆者將其年代定在八四〇至一〇〇〇年間。

(13) [...] täŋridä qut [bulmïš qut o]rnan[mïš] [...]

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收藏的另一件帶有細密畫的摩尼教書頁 MIK III 8259 在第 14-17 行疑似提到一位回鶻可汗的稱號，但是僅存 “täŋridä qut” 和 “[o]rnan[mïš]”。⁷³ 宗德曼受 “[o]rnan[mïš]” 啟發，試圖將其比定為稱號（7）「智海」，並據空格將稱號補全為：“[Ay] täŋridä qut [bulmïš qut o]rnan[mïš] [alpïn ärdämin el] [tutmïš alp arslan]”。⁷⁴ 這種重構顯然過於大膽。稱號中的 “qut ornanmïš” 並非智海稱號特有的因素，在西州回鶻其他統治者的稱號中也有出現，據此僅可判定其為一位西州回鶻早期的統治者的稱號。

書頁的出土地點是高昌故城 α 寺遺址。α 寺在西州回鶻時期曾先為摩尼寺，後被改為佛寺。⁷⁵ α 寺的這次重大轉型發生在什麼時代呢？正是在十一世紀初。⁷⁶ 德藏第一木柱 MIK III 4672 出土於遺址主室地面下的內室 G 的地面中央。回鶻佛教徒在修建或改建佛寺的奠基典禮上將其作為刹木打入基址地下。內室 G 處於遺址的底層，應當是建築較為古老的部分。第一木柱文書寫成的年代在一〇〇八年，則 α 寺在當時始由摩尼寺改建成佛寺。據此可知，摩尼教書頁 MIK III 8259 製成的年代可能在十一世紀以前，而其上殘存的稱號與（7）勘同的可能性很小。

(14) Qutluy ülüglüg [...] ay täŋridä qut bulmï[š] [...] alpïn ärdämin el tu[tmïš ...]
uluy bilgä t[äŋri][...]

德藏摩尼文古突厥語文書 T. M. 301 第 2-5 行提到回鶻可汗稱號 “qutluy ülüglüg [...] ay täŋridä qut bulmï[š] [...] alpïn ärdämin el tu[...] uluy bilgä t[äŋri][...]"。⁷⁷ 茨默

⁷³ 參看 Gulácsi, *Manichaean Art in Berlin Collection*, p. 56; Appendix I, p. 222.

⁷⁴ Sundermann, “Iranian Manichaean Turfan Texts concerning the Turfan Region,” pp. 67-69.

⁷⁵ α 寺遺址中所出土佛經殘片中也有被比定在回鶻時代之前的漢文佛經，如德藏 Ch/U 6972 (T Ia 531) 號殘片被比定為漢文《妙法蓮華經》，寫本似成於七至八世紀（榮新江主編，《吐魯番文書總目·歐美收藏卷》〔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頁 406）。但回鶻佛寺收藏漢文藏經之事見於史乘，因此不能排除 α 寺為九世紀初新建的摩尼寺這種可能。

⁷⁶ 參看付馬，〈兩種回鶻語《阿離念彌本生經》寫本比較研究——兼論西州回鶻早期的譯經活動〉，《西域研究》2018.3 : 46。

⁷⁷ Le Coq, *Türkische Manichaica aus Chotscho*, III, p. 43.

據空格補為 qutluy ülüglüg [elig kün(?)] ay täjridä qut bulmï[š] qut ornanmïš] alpïn ärdämin el tu[tmïš alp arslan] uluy bilgä t[äjri xan]，再度比定為稱號（7）智海。⁷⁸ 從殘留部分的內容和空格數來看，這不失為一種較合理的推測。但是，我們缺少其他證據確證這種重構。在空格中填補其他詞語，也完全有可能構成另外一位已知或未知的回鶻可汗稱號。例如，將其補全作“qutluy ülüglüg [elig kün] ay täjridä qut bulmï[š] buyan ornanmïš] alpïn ärdämin el tu[tmïš ücü(n)č arslan] uluy bilgä t[äjri xan]”，則幾乎可與稱號（18）“Kün ay täjrilärtä qut b[u]lm[i]š [buya]n ornanmïš alpïn [ä]rdämin el tutmïš üçünč arslan bilgä xan”勘同。因此，此稱號尚不能比定為某位確定的回鶻可汗，但其應是一位西州回鶻可汗的全稱。

(15) Kün täjridä qut bulmïš ärdämin el tutmïš alp qutluy uluy bilgä uyγur täjri uyγur xan

法藏敦煌寫卷 Pelliot chinois 3049 出自藏經洞。其正面抄有漢文《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寫於十世紀初。背面寫有回鶻文 82 行。另有 11 行回鶻文反向書寫，內容是獻給回鶻統治者的一段贊詞。寫卷回鶻文部分由哈密屯刊佈、研究。⁷⁹ 在贊詞的 8-11 行出現一位回鶻統治者的稱號，作：“kün täjridä qut bulmïš ärdämin el tutmïš alp qutluy uluy bilgä uyγur täjri uyγur xan”。

由於寫卷出自敦煌藏經洞，則回鶻文部分的大致年代可以判定在九至十世紀。儘管此稱號與牟羽可汗的正式稱號有兩處明顯差別，但哈密屯仍將二者勘同，推測贊詞為西州回鶻摩尼教徒歌頌歷史上開摩尼教於回鶻的牟羽可汗之作。⁸⁰

茨默認為此稱號不屬於漠北回鶻可汗，而應屬於一位西州回鶻可汗。他傾向於將其比定為第三木柱文書所記的稱號（7）。其主要依據就是稱號中出現的“el tutmïš”（護國、鎮國）這一因素。⁸¹ 芮跋辭主張嚴格按照稱號中的因素一一比對，因此反對將其比定為牟羽或（7）智海。⁸² 筆者認為，茨默將其比定為西州回鶻可汗的思路是正確的。但是，敦煌藏經洞可能封閉於一〇〇六年以前，⁸³ 而據第一木柱文書記載，智海可汗在一〇〇七年登基。此外，“el tutmïš”這一因素在西州回

⁷⁸ Zieme, “Manichäische Kolophone und Könige,” pp. 325-326.

⁷⁹ Hamilton, *Manuscrits ouïgours du IX^e-X^e siècle de Touen-Houang*, pp. 37-54.

⁸⁰ Hamilton, *Manuscrits ouïgours du IX^e-X^e siècle de Touen-Houang*, p. 50.

⁸¹ Zieme, “Manichäische Kolophone und Könige,” p. 324.

⁸² Rybatzki, “Türk and Uigur rulers in the Old Turkic inscriptions,” pp. 261-262.

⁸³ 參看榮新江，〈敦煌藏經洞的性質及其封閉原因〉，《敦煌吐魯番研究》2(1996): 23-48。

付馬

鶻可汗稱號中並非僅見於稱號（7），它也出現在稱號（18）中（見下文）。因此，茨默的比定難以成立。

筆者認為，此稱號最重要的特徵並非“el tutmīš”（護國），而是“ärdämin el tutmīš”（以德護國）。“el tutmīš”在漠北回鶻可汗稱號中本就少見，僅有牟羽可汗孤例；加有修飾成分的“el tutmīš”則完全沒有。在西州回鶻可汗稱號中，稱號（7）和（18）中皆有“alpīn ärdämin el tutmīš”（以威、以德護國）字樣。因此，「修飾成分+護國」應當是一個在西州回鶻時代才出現在可汗稱號中的因素。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該統治者稱「汗」（xan）。在漠北回鶻汗國時代，回鶻統治者的正式稱號皆為「可汗」（xayan）。出土文書所見西州回鶻統治者的稱號則名目繁多，有“xayan”、“xan”、“tärkän”、“täŋrikän”、“iđuq täŋri”（聖天）、“iđuq qut”（亦都護），“täŋri elig”（天王）等等，不一而足。在出土文書中，也有提及漠北回鶻可汗而不稱可汗（xayan）者。比如在摩尼教徒的記憶中佔有重要位置的牟羽可汗。在德藏回鶻文書 U73、U72《牟羽可汗入教記》中，他被稱為“täŋri elig bögü xan”（33、52、62 行）或“bögü xan täŋrikän”（80 行）。在德藏回鶻文書 Mainz 345 中，他被稱作“täŋri bögü elig”（正面 4 行）。⁸⁴ 但需要注意的是，上述稱號並非牟羽可汗的正式、完整的稱號。西州摩尼教徒在追記牟羽可汗事蹟時，可能用當時流行的稱謂稱呼過去的可汗，而在西州回鶻時代稱統治者為 xan、elig、täŋrikän 都是可以的。統治者正式、完整的稱號不應與簡稱、俗稱混同。牟羽可汗正式的、完整的稱號並不含有“bögü”（牟羽）一詞，卻以其俗稱「牟羽可汗」著名。本節討論的稱號應當是一個正式的全稱，不能忽略稱號中「汗」與「可汗」的不同，因此這應當是一位西州回鶻可汗的稱號。稱號中不見“arslan”這一因素，可能其在位的年代在十世紀初葉到九三三年之前。

(16) Ay täŋridä qut bulmīš alp [...] uyγur xan

一件赫爾辛基藏粟特文中古波斯語文書中提及一位回鶻統治者“ay täŋridä qut bulmīš alp [...] uyγur xan”。⁸⁵ 宗德曼將稱號補全為“ay täŋridä qut bulmīš alp [bilgä] uyγur xan”，比定為德藏摩尼文中古波斯語文書 M 1《摩尼教讚美詩》跋文中出現

⁸⁴ 參看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から見た安史の亂〉，《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17 (2002) : 124，後收入氏著，《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頁 10。

⁸⁵ 文書刊佈於：N. Sims-Williams and H. Halén, “The Middle Iranian Fragments in Sogdian Script from the Mannerheim Collection,” *Studia Orientalia* 51 (1981): 9-10.

的“ay täjridä qut bulmïš alp bilgä uyγur xayan”，並將其定為漠北時代的昭禮可汗（ay täjridä qut bulmïš alp bilgä uyγur xayan，應為保義可汗）。⁸⁶ 茨默則在空缺處補“qutluy”，認定其為一位西州回鶻的統治者。⁸⁷ 此稱號是一位回鶻可汗正式的全稱，但其頭銜為「汗」(xan)。如果將其比定為漠北時代的昭禮可汗或者保義可汗，則無法回應漠北回鶻可汗的正式稱號都稱「可汗」(xayan) 這一事實。同樣以中古波斯語書寫的 M 1 在記錄保義可汗的正式稱號時就稱「可汗」，符合漠北回鶻汗國時代的傳統。因此，筆者贊同茨默的意見，認為這應當是一位西州回鶻可汗的稱號。

(17) Täjri bögü el bilgä arslan täjri uyγur tärkän

回鶻文《彌勒會見記》哈密本殘卷由一位牧羊人於一九五九年在哈密天山區鐵木耳圖一處山坡上偶然發現。哈密本是現存回鶻文《彌勒會見記》各種寫本中留存篇幅最多者，廣受學者矚目。其中一葉是抄經功德主題記，含有當時的回鶻統治者的稱號。現據前人研究，⁸⁸ 將題記相關內容（1-27 行）轉寫、漢譯如下：

yemä alqatmïš ayqa kösänčig künkä ödrülmïš ädgü ödkä qutluy qïvliy⁸⁹ qoluqa
qutluy qoyn yïl ziin üçünç ay eki otuzqa män üc ärdinikä kertgүç könjüllüg upasi
[čuu]⁹⁰ taš yegän totoq kisim tüzün birlä ken kältäci maitri burxanqa tuşalïm tep
bir maitri soo⁹¹ bázätdimiz: bir maitrisimit nomïn yemä bititdimiz: bu soo
bázätmïš nom bititmiš buyan ädgü qïlinčïy äj öjrä ävirär b[iz üs]tünki äzrua
xormuzta tört [maxarač] täjrilärkä bu buyan ädgü [qïlin]č kükintä täjridäm čoy

⁸⁶ Sims-Williams and Halén, “The Middle Iranian Fragments in Sogdian Script from the Mannerheim Collection,” p. 10, footnote 23.

⁸⁷ 參看 Sundermann, “Iranian Manichaean Turfan Texts concerning the Turfan Region,” p. 71.

⁸⁸ Geng Shimin and H.-J. Klimkeit, *Das Zusammentreffen mit Maitreya: Die ersten fünf Kapitel der Hami-Version der Maitrisimit* (Wiesbaden, 1988), pp. 10-13；Y. Kasai, *Die uigurischen buddhistischen Kolophone* (Brepols, 2008), pp. 195-199；耿世民，《回鶻文哈密本《彌勒會見記》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8），頁 11-14, 42。本文主要依據耿世民先生和笠井幸代 (Y. Kasai) 的讀本，略有調整。

⁸⁹ 笠井氏指出，此詞為下面 qoluqa 一詞的筆誤。隨後更正。

⁹⁰ 因為施主名字 čuu taš yegän totoq 在哈密本中數次出現，可據此補 čuu。耿世民先生和克林凱特將其比定為漢文「麴」，或與早年麴氏高昌國統治家族有關。參看 Geng and Klimkeit, *Das Zusammentreffen mit Maitreya*, p. 11.

⁹¹ 借自漢文「像」（唐五代西北方音），參看 Kasai, *Die uigurischen buddhistischen Kolophone*, p. 198.

付馬

yalin [asıl]zun üstälzün: ul[uş ba]lıq [küyü] kütätü ärzünlär: ičtin sijar [ig ke]gän bolmazun: taşın [sijar] [yayı] böri bolmazun qač[ī] taray küyülü bolzun: qam[ay beş až]un tınlıylar mäjilig b[olzun] [taqī] yemä bu buyanay äŋ öjrä ävirär biz täŋri bögü el bilgä arslan täŋri uyγur tärkänimiz qutığa alqatmiş on uyγur eli: otuz tegit oylanı: toquz elçi bilgäsi: miŋ tapınur tümän içrakiläri birlä miŋ tümän yılıq tägi el ašayu yarlıqamaqları bolzunlar:

時在被贊之月、企盼之日，擇良辰吉時，未年閏 (žiin) 三月廿二日，我，一心信念三寶之優婆塞（麴）答石·移健·都督 (čuu taš yegän totoq) 攜內子都信 (tüzün)，發願與未來將至的彌勒佛相遇，使人畫彌勒像一幅，又使人抄寫《彌勒會見記》經一部。我們最先將畫此像、抄此經的功德善舉回向在上的梵天、帝釋天、四大天王。惟願諸神借此功德法力增長。惟願〔他們〕守護國家、城市。願內無疫病，願外無惡狼。願五穀豐登。願五道中諸有情幸福。復次，我們最先將此功德回向我們的聖天牟羽頡毗伽阿薩蘭聖天回鶻大汗 (täŋri bögü el bilgä arslan täŋri uyγur tärkän) 陛下。惟願陛下與受讚美的十姓回鶻國的三十特勤王子、九大臣、一千僕人、一萬侍臣一起享國，直到千秋萬載！

《彌勒會見記》屬於最早期的回鶻佛教文獻，但哈密本的語言已經反映了 y 語言的特徵，⁹² 則該寫本抄寫的年代應在十世紀以後。題記中有明確的紀年「未年閏三月廿二日」，森安孝夫據此定在十一世紀中有閏三月的未年一〇六七年。⁹³ 題記暗示，功德主應來自「受讚美的十姓回鶻國」(alqatmiş on uyγur eli)，即西州回鶻王國。據上引德藏第三木柱文書記載，西州回鶻的勢力範圍在一〇一九年已經影響到沙州。處在西州和沙州間的伊州（哈密）當時正在西州回鶻的版圖之內。筆者曾撰文指出，哈密地區可能在十一世紀中葉形成獨立政權，脫離西州回鶻統治。⁹⁴ 哈密本《彌勒會見記》寫卷應於一〇六七年在西州回鶻境內抄成，後來被帶到了哈密。

⁹² J. Laut, *Der frühe türkische Buddhismus und seine literarischen Denkmäler* (Wiesbaden, 1986), pp. 75-78, 114-116.

⁹³ 森安孝夫，〈トルコ仏教の源流と古トルコ語仏典の出現〉，《史學雜誌》98.4(1989): 26-27，後收入氏著，《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頁 642-643，注釋 89。

⁹⁴ 付馬，〈宋元之間哈密地區獨立政權的出現——從馬可·波羅對哈密州的記載說起〉，蔡新江、党寶海主編，《馬可·波羅與 10-14 世紀的絲綢之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頁 228-232。

根據回鶻佛教徒發願文的一般結構，在功德回向保護天神之後，功德要回向當時的統治者。⁹⁵ 題記第 22-23 行出現的稱號 “täjri bögü el bilgä arslan täjri uyγur tärkän” 應是當時西州回鶻可汗的稱號，含有西州回鶻可汗稱號的標誌性因素 “arslan”，但此稱號結尾沒有採用 “xan” 或 “xayan”，卻用 “tärkän”。⁹⁶ 克勞森曾提出，「tärkän 是略低於可汗的貴族稱號，常用於女性；用於女性時，應指皇后」。⁹⁷ 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回鶻文譯本中，譯者以 “tärkän qunčuy täjrim” 或 “tärkän qunčuy täjrim xatun” 對譯漢文「皇太后」；⁹⁸ 而以 “tärkän tegin” 對譯「皇太子」。再結合本例可知，“tärkän” 實際上就指政權的最高統治者。⁹⁹ 西州回鶻統治者正式的全稱通常以 “xan” 或 “xayan” 為頭銜，此稱號應是一位可汗的俗稱或簡稱。

(18) Kün ay täjrilärtä qut b[u]lm[i]š [buya]n ornanmīš alpīn [ä]rdämin el tutmīš üčünč arslan bilgä xan

回鶻西大寺遺址位於北庭故城西側。從其建築規模、出土文物質量等因素考量，西大寺應當是西州回鶻的王家寺院。¹⁰⁰ 遺址正殿入口東側牆壁上，有一位回鶻統治者的貼金供養人畫像和榜題。¹⁰¹ 梅村坦將這位回鶻統治者的稱號讀作：“Kün ay täjrilärtä qut b[u]lm[i]š [buya]n ornanmīš alpīn [ä]rdämin el tutmīš üčünč arslan bilgä xan”（自日、月二神處得福佑，福報所在，以威、以德護國、第三獅子智慧汗）。通過比對西州回鶻統治者稱號中的因素，他推斷該可汗在位的年代範圍是十

⁹⁵ 參看 Kasai, *Die uigurischen buddhistischen Kolophone*, p. 43.

⁹⁶ K. Röhrborn, *Die alttürkische Xuanzang-Biographie VII. Nach der Handschrift von Leningrad, Paris und Peking sowie nach dem Transkript von Annemarie von Gabain* (Wiesbaden, 1991), l. 1314; A. Semet, *Lexikalische Untersuchungen zur uigurischen Xuanzang-Biographie* (Wiesbaden, 2005), p. 98.

⁹⁷ G. Clauson,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544.

⁹⁸ K. Röhrborn, *Die alttürkische Xuanzang-Biographie VIII. Nach der Handschrift von Leningrad, Paris und Peking sowie nach dem Transkript von Annemarie von Gabain* (Wiesbaden, 1996), l. 1781; l. 1944; Semet, *Lexikalische Untersuchungen zur uigurischen Xuanzang-Biographie*, p. 98.

⁹⁹ 現在學者認為，“tärkän” 在詞源上是由 “täjrikän” 首音節尾鼻音脫落而來，參看 P. Zieme, “Paul Pelliot and tärim,” *Journal of Sino-Western Communications* 7.2 (2015): 255。

¹⁰⁰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北庭高昌回鶻佛寺遺址》（瀋陽：遼寧美術出版社，1991），頁 172-173。

¹⁰¹ 圖片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庭高昌回鶻佛寺遺址》，彩版 10。

付馬

一世紀末至十二世紀初。¹⁰² 作為西州回鶻的王家寺院，此寺應當建成在佛教取代摩尼教成為國教之後，即十一世紀初以後。該可汗稱號中最引人注目的因素是 “[buya]n ornanmīš”（福報所在）。“buyan” 為梵文 “puṇya” 借入古突厥語的形式，是回鶻佛教語言中標誌性的術語之一。在可汗稱號中出現佛教術語，反映了當時佛教的主導地位，以及佛教語言的成熟化。如果此詞的復原準確，則可確定此可汗在位時間在十一世紀以後。

(19) Bögülüg uluy iduq qut

一九一二年前後出土於吐魯番吐峪溝的《土都木薩里修寺碑》記載了回鶻佛教徒出資重修當地寺院的事跡。¹⁰³ 耿世民先生曾全面研究此碑。¹⁰⁴ 碑文自第 21 行起為施主修寺功德回向願文，現據耿先生的研究摘引如下：¹⁰⁵

bu buyanïy ävirä ötünü täginürbiz üstünki äzrua xormuzta tört maxarač täjrilär
basa qamay qut waxşik täjrilärkä: yana ävirä ötünü täginürbiz täjri bögü
täjrikänimiz. . bögülüg uluy iduq qut qutïja täjrikän tärgäk(?) qu[nču]y täjrim
qutïja tärkän tegin täjrim qutïja alp činqrur tegin t(ä)ñrim qutïja...

我們惟願此功德回向天上的梵天 (äzrua)、帝釋天 (xormuzta)、四天王 (tört maxarač) 等一切守護神 (qut waxşik täjrilär)。復次，我們惟願〔此功德〕回向我們的登里牟羽聖天〔可汗〕……牟羽錄胡祿亦都護 (täjri bögü täjrikänimiz. . bögülüg uluy iduq qut)，〔回〕向聖天 tärgäk(?) 公主登林 (täjrikän tärgäk(?) qu[nču]y täjrim)，〔回〕向皇太子登林 (tärkän tegin täjrim)，〔回〕向合升豁兒特勤登林 (alp činqrur tegin täjrim)……

碑文在第 22-23 行提到當時西州回鶻統治者，作 “täjri bögü täjrikänimiz. . bögülüg uluy iduq qut”。耿先生認為，這是已故高昌回鶻第一代統治

¹⁰² H. Umemura, “A Qočo Uyghur King Painted in the Buddhist Temple of Beshbalıq,” *Turfan, Khotan und Dunhuang* (Berlin, 1996), pp. 361-378.

¹⁰³ 文物情況參看黃文弼，《吐魯番考古記》，頁 64。原碑今不存，拓片圖版參看黃文弼，《吐魯番考古記》，圖版 99。

¹⁰⁴ 耿世民，〈回鶻文《土都木薩里修寺碑》考釋〉，《世界宗教研究》1981.1：304-311，後收入氏著，《維吾爾古代文獻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3），頁 422-432。耿世民先生所據拓片藏於中國歷史博物館（現中國國家博物館），編號 1,3,767（原編號：京 41、考 3431）。

¹⁰⁵ 耿世民，〈回鶻文《土都木薩里修寺碑》考釋〉，頁 307；氏著，《維吾爾古代文獻研究》，頁 426-427。筆者在耿先生轉寫的基礎上略加調整。

者的稱號，其後的“täŋrikän tärgäk”為當時的回鶻統治者稱號，而“qu[nču]y täŋrim”則指當時的王后。¹⁰⁶此說或難信從。從文脈看，每一位功德回向對象的稱號之後都有敬語“qutïŋa”（致）。因此，“täŋrikän tärgäk qu[nču]y täŋrim”應指一人，即當時的王后；而“täŋri bögü täŋrikäni[m]iz...bögülüg uluγ iđuq qut”則應指當時的統治者。

筆者認為，整個稱號應從中間的複數第一人稱領屬附加成分“-imiz”（我們的）處斷開：前半部分“täŋri bögü täŋrikän”是泛稱，後半部分“bögülüg uluγ iđuq qut”才是這位統治者的俗稱或簡稱，含有其稱號中的核心因素。整個稱號的漢文直譯應為「我們神一樣變化無窮的聖天〔可汗〕：牟羽錄胡祿亦都護」。引人注意的是，這位統治者被稱為「亦都護」。一二〇九年，西州回鶻統治者巴而朮阿而忒的斤歸順蒙古汗國。在蒙古大汗治下，畏兀兒統治者只稱亦都護，而不能再稱汗。這種情況在西遼時代應當就已經開始。《元史·哈刺亦哈赤北魯傳》記：「哈刺亦哈赤北魯，畏兀人也。性聰敏，習事。國王月仙帖木兒亦都護聞其名，自唆里迷國徵為斷事官。月仙帖木兒卒，子八兒出阿兒忒亦都護年幼，西遼主鞠兒可汗遣使據其國，且召哈刺亦哈赤北魯，至則以為諸子師。」¹⁰⁷這說明，在西遼統治時代，巴而朮阿而忒的斤的父親也稱亦都護，以避諱西遼統治者的稱號。西州回鶻統治者在受到西遼、蒙古等政權統治時，避用「汗」、「可汗」稱號而只稱「亦都護」，說明其早有以「亦都護」指稱可汗之傳統；採用「亦都護」這個稱號對外可以回避西遼、蒙古最高統治者的尊號，對內又有相當於「汗」或「可汗」的傳統意味，沒有降低統治者的級別。回鶻人稱統治者為亦都護最早的一個案例出現在一件摩尼文古突厥語文獻（德藏 M 919）中，說明在西州回鶻王國初期或漠北回鶻汗國統治東部天山時代，回鶻人就有稱統治者為「亦都護」的情況。該文書的正面 12-15 行記：“qaltïi yana kün täŋri ornïnta yaruq ayy täŋri yasïyu bälgrünä yarlıqarça eligimiz iđuq qut oloq (uluγ) orunta bälgrünä yarlıkadî”（當光明的月神再度出現在日神的位置閃耀，我們的國王亦都護就出現在王位上）。¹⁰⁸

¹⁰⁶ 耿世民，〈回鶻文《土都木薩里修寺碑》考釋〉，頁 310-311；氏著，《維吾爾古代文獻研究》，頁 430-431。

¹⁰⁷ 宋濂，《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點校本），卷一二四，頁 2046。

¹⁰⁸ 最早由勒柯克刊佈，參看 Le Coq, *Türkische Manichaica aus Chotscho*, III；此據森安孝夫的轉寫，參看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から見た安史の亂〉，《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17(2002): 140，後收入氏著，《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頁 22。

付馬

下面討論這位統治者在位的時代。碑文 10-14 行記：

qočo ulušnij basmaqī toyuq qisiltä qasinciry uluy varxar samgramlar etip yaratıp bütürmişlär öküš tälîm ödlärniç qolularnij ärtmäkiňä etiglig nomlarnij ornaysızıňja bu varxar samgram buzulup artap idisiz igäsiz bolup turmisiňja män an baylıy toyin män tudum şäli buzulmisiň etip opraqin sapip yanjirdi lin prayan etdim.

他們在高昌國的重地吐峪溝中建造了雄偉高大的寺廟。許多光陰過去，教法失掉了位置，這寺院被破壞，衰敗，成為無主之地。我，安姓僧；我，土都木薩里。重新修建被毀的〔寺廟〕。建僧房。

直到陷落於吐蕃之前，西州地區的佛教活動依然昌盛。七九二年，西州沒入吐蕃，隨後不久又被回鶻吞併。在九世紀，回鶻的國教摩尼教傳入西州地區。由於受到統治階層的支持，摩尼教在高昌地區得到迅速發展。碑文所謂教法失位、寺廟被毀的時代應當就是在九世紀回鶻摩尼教進入高昌之時。交河故城出土的摩尼教懺悔詞記有禁止摩尼教徒褻瀆佛教寺院的內容，¹⁰⁹ 當時確有摩尼教徒毀佛寺事件發生。從十世紀下半葉起，摩尼教在西州回鶻王國開始衰落，佛教逐漸興起，並取代摩尼教成為主要宗教；到十一世紀下半葉，摩尼教已經在吐魯番地區趨於消亡。¹¹⁰ 則安僧和土都木薩里重修佛寺之事應當在十世紀下半葉以後。

在吐魯番出土的文字材料中，還有其他一些具有宗教背景的文獻與此碑文性質類似。其中能明確定年者，都屬於十世紀末、十一世紀初。前引德藏 M 112 摩尼教寺院被毀文書定年在九八三年，顯示當時回鶻統治者已經開始拆摩尼寺以建佛寺。前引第一木柱文書作於一〇〇八年，記錄回鶻佛教徒將高昌城內的摩尼寺改建成佛寺之事。在此階段，西州的佛教勢力已經與摩尼教勢力展開激烈的資源爭奪。另一批出土文獻則反映了這一時期西州回鶻佛教徒興建佛寺的情況。成於九八三年的德藏第二木柱 MIK III 7295 上書漢文文書，記載了回鶻佛教徒在新興

¹⁰⁹ A. v. Le Coq, *Chuastuanift, ein Sündenbekenntnis der manichäischen Auditores. Gefunden in Turfan (Chinesisch-Turkistan), Abhandlungen der Preussens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 Anhang 4* (Berlin, 1910), pp. 3-43.

¹¹⁰ 九至十一世紀西州地區宗教變遷史，參看 T. Moriyasu, “Chronology of West Uighur Buddhism: Re-examination of the Dating of the Wall-paintings in Grünwedel’s Cave No.8 (New: No.18), Bezeklik,” *Aspects of Research into Central Asian Buddhism* (Brepols, 2008), pp. 191-228；同作者，〈西ウイグルの仏教クロノロジー〉，氏著，《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頁 645-677。

谷（勝金鄉）中興建佛寺之事。¹¹¹ 前引[第三木柱文書則反映了回鶻佛教徒於一〇一九年在高昌城中興建佛寺之事。¹¹² 德藏回鶻文寫本*U 9193（原件今不存）為回鶻文《金光明經》題記，寫於一〇二二年，反映了回鶻佛教徒在交河城中興建佛寺之事。¹¹³ 筆者推測，安僧、土都木薩里修寺之舉應當在這些活動之前。隨著西州回鶻佛教勢力的發展，他們可能先重修以前的廢寺，再與摩尼教爭奪大型寺廟建築，或興建寺廟。充分利用西州各地棄置的寺廟可能是回鶻佛教徒修建佛寺的第一步。因此，筆者推斷碑文所記回鶻統治者在位的時間為十世紀後半葉，年代應該置於（3）、（4）兩位統治者之間。

(20) [...]qutluy arslan bilgä täŋri elig

在柏孜克里克千佛洞葛蘭威德爾 (A. Grünwedel) 編號第 10 窟壁上有供養人畫像和榜題，被勒柯克切割後帶回柏林，入藏亞洲藝術博物館（時為印度藝術博物館），現編號為 MIK 8384。其中一條回鶻文題記以紅字分兩行書寫，僅左邊一行可讀。據勒柯克轉寫知，題記殘留回鶻統治者稱號一部分，作： [...]qutluy arslan bilgä täŋri elig。¹¹⁴ 可惜該題記圖片未曾刊佈。據德國探險隊的調查，10 號窟的年代屬九至十二世紀，這位統治者應是一位西州回鶻可汗。其稱號中具有十世紀中葉以後西州回鶻統治者稱號中標誌性的因素“arslan”。

(21) Köl bilgä täŋri boquy uyγur xayan

目前出土的回鶻錢幣有三類，均為漢式圓形方孔錢。第一類是「日月光金」錢。錢幣一面有漢文「日月光金」四字，另一面書寫民族文字。有研究認為民族文字為魯尼文書寫古突厥語「錢幣日月光金（星）」，¹¹⁵ 但並未被學界普遍接受。這類錢幣最早出土於北庭回鶻西大寺，後來又在蒙古高原和吐魯番地區出土。第二

¹¹¹ 森安孝夫，〈西ウイグル王國史の根本史料としての棒杭文書〉，氏著，《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頁 683, 708-709。

¹¹² 森安孝夫，〈西ウイグル王國史の根本史料としての棒杭文書〉，氏著，《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頁 684, 689。

¹¹³ Kasai, *Die uigurischen buddhistischen Kolophone*, pp. 76-80.

¹¹⁴ A. v. Le Coq, *Die Buddhistische Spätantike in Mittelasien, III: Die Wandmalereien* (Berlin, 1924), p. 44.

¹¹⁵ 努爾蘭・肯加哈買提，〈日月光金錢胡書考〉，《中國錢幣》2007.1 : 41-46。

付馬

類是單面回鶻錢，上有回鶻文銘文“*ıduq yarlıy yorızun*”（願聖意通達）。¹¹⁶

第三類是雙面回鶻錢，兩面有回鶻文銘文，連讀作“*köl bilgä tājri boquy uyγur xayan el tutmīš yarlıyinqa*”（在闢毗伽登里卜古回鶻可汗護國之令下）。¹¹⁷ 有學者將“*el tutmīš*”解作可汗的名字，¹¹⁸ 今不取。這應是名詞“*yarlıy*”（令）的修飾成分。蒂埃里（F. Thierry）據法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的一枚此類銅錢將銘文首字讀作“*kül*”。¹¹⁹ 根據前文列舉的資料，開頭讀作“*köl bilgä*”更符合西州回鶻的情況。此稱號中出現回鶻建國傳說中的卜古汗的名字“*boquy*”。如果這是一位特定可汗的稱號，則其活躍的年代尚難以確定。

還有一種可能是，此稱號並非指示一位特定的可汗。前兩類回鶻錢幣已經明示，回鶻錢幣上並不一定標明發行當時的統治者稱號或年號。第三類錢幣目前出土數目不少，¹²⁰ 如果其上所鐫為一位具體的可汗稱號，反而令人生疑：為何不見帶有其他可汗稱號的錢幣？為何獨獨這位可汗將稱號刻在錢幣上？

（22）回鶻王畢勒哥=喝里可汗=*Qarī bilgä xayan (-1127-1130/1131-)

《金史·太宗本紀》記：天會「五年（1127）正月……丁巳，回鶻喝里可汗遣使入貢」。¹²¹「喝里」二字晚期中古音可以復原作*xatli，元代音作*xəli，或可復原為古突厥語“qarī”（老）。新近在西安發現的漢文、魯尼文突厥語雙語《回鶻葛啜王子墓誌》中，墓主人的突厥語稱號正是“Qarī čor tegin”。¹²² 是為“qarī”一詞見於回鶻王族稱號中的實例。前述稱號（2）將古突厥語“tājri”音寫作「登曷哩」，

¹¹⁶ 參看伊斯拉非爾·玉蘇甫、安尼瓦爾·哈斯木，〈新疆博物館館藏古錢幣〉，侯世新主編，《西域歷史文化寶藏探研——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論文集》第2輯（烏魯木齊：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2009），頁147。

¹¹⁷ 伊斯拉非爾·玉蘇甫、安尼瓦爾·哈斯木，〈新疆博物館館藏古錢幣〉，頁149。

¹¹⁸ 伊斯拉非爾·玉蘇甫、安尼瓦爾·哈斯木，〈新疆博物館館藏古錢幣〉，頁149。

¹¹⁹ F. Thierry, “Les Monnaies de Boquq Qaghan des Ouighours,” *Turcica* 30 (1998): 269.

¹²⁰ 除法國國家圖書館一枚、新疆自治區博物館一枚以外，其餘還有大量散落在民間藏家手中。民間散落的大概情況可參看錢伯泉，〈高昌故城和北庭故城發現的回鶻文銅錢研究〉，《古代錢幣與絲綢高峰論壇暨第四屆吐魯番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頁48。

¹²¹ 脫脫等，《金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點校本），卷三，頁56。

¹²² 見於墓誌魯尼文部分第11-12行，參看：芮跋辭、吳國聖，〈西安新發現唐代葛啜王子古突厥魯尼文墓誌之解讀研究〉，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19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頁436；成吉思，〈《葛啜墓誌》突厥文銘文的釋讀〉，榮新江，《唐研究》第19卷，頁443-445。

則此稱號中的「喝里」也有可能是「登喝哩」脫字的結果，所指即“täŋri xayan”。

《遼史·耶律大石本紀》記：¹²³

明年二月甲午，〔大石〕以青牛白馬祭天地、祖宗，整旅而西。先遺書回鶻王畢勒哥曰：「昔我太祖皇帝北征，過卜古罕城，即遣使至甘州，詔爾祖烏母主曰：『汝思故國耶，朕即為汝復之；汝不能返耶，朕則有之。在朕，猶在爾也。』爾祖即表謝，以為遷國於此，十有餘世，軍民皆安土重遷，不能復返矣。是與爾國非一日之好也。今我將西至大食，假道爾國，其勿致疑。」畢勒哥得書，即迎至邸，大宴三日。臨行，獻馬六百，駝百，羊三千，願質子孫為附庸，送至境外。

一般認為，上述記載反映了耶律大石在一一三〇或三一年西征時借道西州回鶻的情形。¹²⁴ 可知，當時的西州回鶻統治者的稱號中有畢勒哥，可還原作突厥語“*bilig”或“*bilgä”。鑑於“bilgä”為回鶻可汗稱號中的常見因素，權取之。可能這位回鶻王就是三或四年前被金朝使官記錄的喝里可汗。筆者權將此二稱號定為一人。

經過上文的討論，有一些西州回鶻統治者的稱號可以確定大致的年代，或與傳世文獻的記載相印證。筆者現將這些統治者的稱號、年代以表格形式呈現，是為重構西州回鶻統治者年代體系的初步嘗試。

表一：西州回鶻統治者年代體系重構

序列	稱號（古突厥語）	稱號（漢文）	性質	年代	史料
1 (1) ¹²⁵	*Boyuq kün/kül/kür täŋri elig	僕固俊 僕固天王	名 簡稱	-866-876-	漢文史籍 BD11287、Pelliot chinois 5007、 xj222-0661.09、 《記述的裝飾》

¹²³ 脫脫等，《遼史》卷三〇，頁402。

¹²⁴ 關於此事的年代，梁園東先生最早考證為一一三〇年，參看布萊茲須納德著，梁園東譯註，《西遼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譯註16，頁35-40。這一年代現已被多數學者所遵從，參看 M. Biran, *The Empire of the Qara Khitai in Eurasian History: Between China and the Islamic World* (Cambridge, 2005), p. 36。此外，周良霄先生認為更可能的年代是一一三一年，論據同樣有力，參看周良霄，〈關於西遼史的幾個問題〉，《中華文史論叢》1981.3：248-250。

¹²⁵ 括號內數字為前文出現的順序，下同。

付馬

序列	稱號（古突厥語）	稱號（漢文）	性質	年代	史料
2 (2)	*Uyyur ay täjridä [...] qut bulmïš külug köl bilgä [...] ïduq täjri xayan	回鶻愛登曷哩阿 那骨牟里彌施俱 錄闕蜜伽□□聖 [天]可汗	全稱	933 年以前	《造塔功德記》
3 (15)	Kün täjridä qut bulmïš ärdämïn el tutmïš alp qutluγ uluy bilgä uyγur täjri uyγur xan		全稱	十世紀初葉 至 933 年前	Pelliot chinois 3049
4 (3)	Törtünç el bilgä täjri elig		簡稱	-954-	M 112
5 (19)	Bögülg uluγ ïduq qut		簡稱	十世紀後半	《土都木薩里修 寺碑》
6 (4)	Törtünç arslan bilgä täjri elig süŋlüg xayan	西州外生師子王 阿斯蘭漢	全稱 簡稱	-981-984-	漢文史籍 M 112
7 (5)	Bögü bilgä täjri elig *Bögü arslan bilgä täjri elig qutluγ küčlüg xayan	祿勝	簡稱 全稱	966-1003-	黃文彌曆日文 書、漢文史籍
8(6)、(7)	Köl bilgä täjri elig Köl bilgä xan Kün ay täjridä qut bulmïš uluγ qut ornanmïš alpïn ärdämïn el tutmïš alp arslan qutluγ köl bilgä täjri elig on uyγur xan	可汗師子王智海	簡稱 全稱	1007-1024-	第一木柱、第三 木柱、漢文史料、 《突厥語大詞 典》
9 (17)	Täjri bögü el bilgä arslan täjri uyγur tärkän		簡稱	-1067-	哈密本《彌勒會 見記》題記

序列	稱號（古突厥語）	稱號（漢文）	性質	年代	史料
10 (18)	Kün ay täjrilärtä qut b[u]lm[i]š [buya]n ornanmīš alpīn [ä]rdämīn el tutmīš üčünč arslan bilgä xan		全稱	十一至十二世紀初	北庭西大寺正殿入口東壁題記
11 (22)	*Qarī bilgä xayan	回鶻王畢勒哥 喝里可汗	簡稱	-1127- 1130/1131	漢文史籍
12	*Äsän temür iđuq qut	月仙帖木兒亦都護	簡稱	受西遼統治，此後皆稱亦都護	漢文史籍

三・西州回鶻統治者稱號的結構與特徵

(一) 正式稱號的結構

學界根據傳世漢文史料及《九姓回鶻可汗碑》等石刻材料已將漠北回鶻汗國可汗的稱號體系復原。芮跋辭曾系統研究這些稱號，¹²⁶ 將漠北回鶻可汗的正式稱號在結構上劃分為三部分：1. 稱號來源 (intitulation)；2. 定性特徵 (definite attribute)；3. 固定的頭銜「毗伽可汗」(bilgä xayan)。¹²⁷ 「稱號來源」的固定格式可分為兩類：一是 “täjridä bolmīš” (從天而生的)；一是 “ay/kün täjridä qut bulmīš” (從月神 / 日神處獲得福佑的)。

在上文中，筆者枚舉了傳世史料和各種語文出土文書所見的西州回鶻統治者稱號，分析其性質，並嘗試對其中一些人物進行斷代。這些散見稱號的性質不盡相同，大致可以歸為全稱、簡稱和泛稱三大類。其中保存比較完整並可以大致斷代的全稱有四個：

¹²⁶ 參看 Rybatzki, “Türk and Uigur rulers in the Old Turkic inscriptions,” pp. 244-251.

¹²⁷ 芮跋辭氏原文中也將 2、3 兩部分合稱為「標誌性稱號」(significant name-title)，又將第 2 部分稱為「修飾性特徵」(describing attribute)，定義並不嚴整 (參看 Rybatzki, “Türk and Uigur rulers in the Old Turkic inscriptions,” p. 245)。

付馬

- (2) *Uyγur ay täŋridä [...] qut bulmïš külüg köl bilgä [...] iđuq täŋri xayan
(866-933)
- (15) Kün täŋridä qut bulmïš ärdämin el tutmïš alp qutluγ uluγ bilgä uyyur täŋri
uyyur xan (900-933)
- (7) Kün ay täŋridä qut bulmïš uluγ qut ornanmïš alpïn ärdämin el tutmïš alp
arslan qutluγ köl bilgä täŋri elig on uyyur xan (1007-1024-)
- (18) Kün ay täŋrilärtä qut b[u]lm[i]š [buya]n ornanmïš alpïn [ä]rdämin el
tutmïš ücünč arslan bilgä xan (十一至十二世紀初)

比較這些全稱可知，漠北回鶻可汗正式稱號中的三部分都被繼承沿用。1. 稱號的起首為相對固定的形式“ay/kün täŋridä qut bulmïš”，沿用漠北時代即已形成的傳統，即芮跋辭所謂的「稱號來源」。2. 稱號的中間部分有標誌這位可汗獨特身分的「定性特徵」。這位可汗的簡稱即由這一部分中的若干因素構成。譬如，西州回鶻可汗（7）在回鶻文獻中（「第一木柱銘文」）被稱為“köл bilgä täŋri elig”，在伊斯蘭史料中（《突厥語大辭典》）被稱為“köл bilgä xan”，在漢文史籍中被稱為「可汗師子王智海」(*arslan köл bilgä xayan)。這些簡稱中所反映的因素“arslan”、“köл bilgä”都出現在其全稱（7）的「定性特徵」中。3. 稱號的最後是頭銜「可汗」(xayan) 或「汗」(xan)。

與漠北回鶻可汗的稱號相比，西州回鶻可汗的全稱中最明顯的特徵是“alpïn ärdämin el tutmïš”（以威、以德護國的）和“qut/buyan ornanmïš”（福報所在的）這兩組固定形式的形動詞短語。在漠北回鶻可汗中，只有第三代可汗牟羽可汗的全稱中出現“el tutmïš”（護國的）這一因素，但其前面並無修飾成分“alpïn”或“ärdämin”。除此之外，僅有第二代可汗磨延啜的全稱中出現類似的形動詞因素“el etmiš”（建國的）。在漠北汗國時代，這類形動詞因素顯然應當置於稱號的「定性特徵」這一範疇中。它們只見於個別可汗的稱號中，是標識可汗身分的特定因素。以前在材料不夠充分的情況下，有學者也將其看作「定性特徵」用以判斷西州回鶻可汗稱號的屬性。¹²⁸ 但在西州回鶻可汗稱號中，這兩種形動詞因素頻繁出現。在上引的四個可以大致斷代的稱號中，除（2）外，都含有這兩組形動詞因素（之一）。在前文枚舉的可汗稱號中，還有一些保存不完整和不能確定年代的稱號也屬於全稱。這些稱號中全都出現上述形動詞因素（之一），現列舉如下：

¹²⁸ 參看 Zieme, “Manichäische Kolophone und Könige,” p. 325.

- (12) Ay täŋridä qut bulmïš qut ornanmïš alp[in ärdämin el t]utmïš[...]
- (13) [...] täŋridä qut [bulmïš qut o]rnan[mïš]] [...]
- (14) Ay täŋridä qut bulmï[š] [qut/buyan ornanmïš?] alp[in ärdämin el tu[tmïš ...]
uluy bilgä t[änri][...]

此外，可汗號（8）[...]qut ornanmïš alp qutluy köl bilgä täŋri xan 雖然缺失了開頭部分，但從稱號存留的部分看，應當也是一個由「稱號來源」+「定性特徵」+頭銜構成的完整稱號，也含有“qut ornanmïš”這一成分。

元代文人歐陽玄所撰《高昌偰氏家傳》中記有：

高昌王有印曰「諸天敬護護國第四王印」，即唐所賜回鶻印也。言諸天敬護者，其國俗素重佛氏。因為梵言以祝之也。¹²⁹

基於前節對各種材料所見西州回鶻可汗稱號的討論，筆者將印文中出現的漢文稱號「諸天敬護護國第四王」復原作古突厥語 “*Täŋrilärtä qut bulmïš el tutmïš törtünč xan”。稱號中出現的因素皆可見於前文所列的西州回鶻可汗稱號中。此稱號也具備「稱號來源」、「定性特徵」和頭銜三部分，是一個全稱，並具有“el tutmïš”這一因素。

除了上述列舉的可汗稱號外，在可汗以下的貴族高官的稱號中也具有這類因素，足見其在西州回鶻時代統治階層稱號中的流行程度。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第 19 號窟出土的回鶻佛教供養人畫像旁有紅字榜題作：¹³⁰ “Täŋrikän el tutmïš alp arslan toql¹³¹ to[ŋa] tegin ögä tärkän tegin el toyril bäge”。這位貴族可能是西州回鶻的太子“tärkän tegin”，其稱號中也有“el tutmïš”這一因素。此外，一〇四一年向宋朝遣使的「沙州鎮國王子」¹³² 被森安孝夫考為西州回鶻的王子，其稱號中的「鎮國」即被推定為“el tutmïš”。¹³³

綜上，在已知的西州回鶻統治者全稱中，其「稱號來源」之後大都帶有以“qut ornanmïš”和（或）“el tutmïš”為中心構成的形動詞因素。顯然，這種因素已經從漠北回鶻可汗稱號的「定性特徵」的一種，固定為一種結構性因素。上述兩類形動

¹²⁹ 歐陽玄撰，陳書良、劉娟校點，《歐陽玄集》（長沙：嶽麓書社，2010），頁 171。

¹³⁰ Le Coq, *Die Buddhistische Spätantike in Mittelasien*, III: *Die Wandmalereien*, p. 47, Tafel 18.

¹³¹ 森安孝夫讀作qutluy，參看氏著，〈沙州ウイグル集團と西ウイグル王國〉，《内陸アジア史研究》15(2000): 29，後收入氏著，《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頁 366。

¹³²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點校本），卷一三一，頁 3115。

¹³³ 森安孝夫，〈沙州ウイグル集團と西ウイグル王國〉，《内陸アジア史研究》15(2000): 26，後收入氏著，《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頁 362。

付馬

詞短語所修飾的對象是位於全稱最後的頭銜「汗」或「可汗」，筆者稱其為「固定修飾成分」(frozen attribute)。則西州回鶻可汗全稱的結構可總結如下：

稱號來源	+	固定修飾成分	+	定性特徵	+	頭銜
(uluy) qut (buyan) ornanmīš						
「〔大〕福（福報）所在的」						
(alpīn) (ärdämin) el tutmīš						
「〔以威〕、〔以德〕護國的」						

表二：西州回鶻統治者全稱一覽及結構分析

序列	稱號來源	固定修飾成分	定性特徵	頭銜	年代
1 (2)	*ay täjridä qut bulmīš	無	külg köl bilgä [...] iduq täjri	xayan	866-933
2(15)	kün täjridä qut bulmīš	ärdämin el tutmīš	alp qutluy uluy bilgä uyγur täjri	xan	900-933
3 (8)	缺	qut ornanmīš	alp qutluy köl bilgä täjri	xan	十一世紀前
4(12)	ay täjridä qut bulmīš	qut ornanmīš alp[in ärdämin el t]utmīš	缺	缺	十一世紀前
5(13)	[...] täjridä qut [bulmīš]	qut o]rnān[mīš...]	缺	缺	十一世紀前
6(14)	ay täjridä qut bulmī[š]	(qut/buyan ornanmīš) alpīn ärdämin el tu[tmīš ...]	[...] uluy bilgä t[äjri]	缺	十一世紀前
7 (7)	kün ay täjridä qut bulmīš	uluy qut ornanmīš alpīn ärdämin el tutmīš	alp arslan qutluy köl bilgä täjri elig on uyγur	xan	1007-1021-
8(18)	kün ay täjrilärtä qut b[u]lm[i]š	[buya]n ornanmīš alpīn [ä]rdämin el tutmīš	üçünč arslan bilgä	xan	十一至十二世紀初
9	*täjrilärtä qut bulmīš	el tutmīš	törtünč	xan	十三世紀以前

唯一的例外是可汗稱號（2）。其年代應在九三三年以前，是現存屬於西州回鶻時代最早的可汗全稱之一。此稱號的結構幾乎與漠北時代的回鶻可汗稱號一致，反映了西州回鶻王國初期仍然沿用著漠北回鶻時代的傳統，全稱中尚未出現「固定修飾成分」。與其類似的情況還可舉出安西回鶻可汗龐特勤的全稱。在漠北回鶻汗國崩潰以後，一部分回鶻部眾西遷至東部天山地區。在西州回鶻政權建立之前，東部天山地區統一在安西回鶻龐特勤的麾下。¹³⁴ 唐朝在八五六年遣使王端章入安西冊封龐特勤為「溫祿登里羅汨沒密施合俱錄毗伽懷建可汗」。但王端章一行在伊州一帶被劫掠，不至而還。¹³⁵ 值得注意的是，在唐朝冊封龐特勤之前，他已經自立為可汗，並請求唐朝冊封。因此，稱號「溫祿登里羅汨沒密施合俱錄毗伽懷建可汗」中「懷建」二字應為唐朝所賜，而「溫祿登里羅汨沒密施合俱錄毗伽」則應為龐特勤自立為可汗時所採用的稱號。這個稱號最早由哈密屯還原為 “*Uluγ täjridä qut bulmïš alp külüg bilgä xayan”¹³⁶。與可汗號（2）一樣，龐特勤的稱號也完全符合漠北時代的稱號結構，在「稱號來源」之後並沒有出現「固定修飾成分」。漠北回鶻汗國崩潰以後，在東部天山地區相繼建立的回鶻政權沿用著漠北回鶻可汗的稱號體系，沒有變化。這種情況從安西回鶻時代持續到西州回鶻時代早期。因此，筆者將特例（2）解釋為西州回鶻時代早期可汗稱號結構由漠北傳統向新的形式演化的過渡形態。

（二）「稱號來源」的歷史流變

十一世紀以前的西州回鶻可汗全稱的「稱號來源」部分沿用了漠北回鶻時代的傳統，皆以 “ay/kün täjridä qut bulmïš”（從月神 / 日神處獲得福佑的）的形式出現。關於這種傳統，學界普遍認為是回鶻統治者皈依摩尼教以後受摩尼教影響而形成。¹³⁷ 據摩尼教教義，日、月為光明宮殿（「二大明船」），分別為拯救光明

¹³⁴ 關於九世紀後半葉東部天山地區從安西回鶻政權過渡到西州回鶻政權的歷史，參看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の西遷について〉，《東洋學報》59.1/2(1977)：112-116，後收入氏著，《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頁276-298；付馬，〈西州回鶻王國建立初期的對外擴張〉，頁145-162。

¹³⁵ 參看榮新江，〈大中十年唐朝遣使冊立回鶻史事新證〉，《敦煌研究》2013.3：128-132。

¹³⁶ Hamilton, *Les ouighours à l'époque des Cinq Dynasties*, p. 142.

¹³⁷ 日本學者田阪興道最早提出這一觀點，參看氏著，〈回紇に於ける摩尼教迫害運動〉，《東方學報》11.1(1940)：229-231；參看森安孝夫，〈東西ウイグル帝國マニ教史の新展開〉，氏著，《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頁551。西方學界中，龐巴奇 (A. Bombaci) 最

付馬

的神祇所居之地。日宮為「第三使」(Third messenger)、「淨風」(Living spirit) 等所居，月宮則為「夷數光明者」(Jesus the light one，即耶穌)、「惠明使」(Maiden of light) 和「初人」(First man) 等所居。克林凱特指出，古突厥語摩尼教文獻中的月神 (ay täjri) 就指「夷數」，而日神 (kün täjri) 則特指「淨風」。¹³⁸ 漠北回鶻可汗稱號以“ay/kün täjridä qut bulmīš”式作「稱號來源」者中，多數取月神，少數取日神。¹³⁹ 十一世紀以前的西州回鶻可汗稱號延續了這種特點。不論回鶻可汗是從日神還是從月神處獲得福佑，其稱號的來源都是一個神祇。

然而，這種形式在十一世紀以後發生了改變。可以準確斷代在十一世紀初的可汗稱號 (7) 的「稱號來源」作“kün ay täjridä qut bulmīš”，首次出現了日、月並舉的情況。克林凱特依然將其中的“kün ay täjri”讀作一個神祇，比定為「夷數」。其依據是，摩尼教也有觀念認為夷數居住的宮殿是日、月兩宮，故在古突厥語文獻中夷數也被稱為「日月神」(kün ay täjri)¹⁴⁰ 克氏的意見解釋此案尚可圓通，但卻無法解釋定年在十一世紀至十二世紀初的稱號 (18)。該稱號以“kün ay täjrilärtä qut bulmīš”(從日、月諸神處獲得福佑)起首。“täjri”(神)一詞明確使用了複數，意指「日、月諸神」。如此一來，克氏對 (7) 的解讀不禁令人生疑。在古突厥語中，複數詞綴的使用並非必要，不帶有複數附加成分的名詞也可以表達複數含義。¹⁴¹ 因此，稱號 (7) 的「稱號來源」部分完全可以讀作「從日神、月神處獲得福佑」。另外，克氏的解說在邏輯上也存在疑問：如果從漠北時代一直到十一世紀前，回鶻可汗都以月神作「夷數」，且在稱號中已形成數百年的固定傳統，何以在十一世紀初改用「日月神」替代「月神」指夷數呢？因此，筆者認為 (7) 的「稱號來源」應當解讀為「從日、月諸神處獲得福佑」，表現的是多個神祇，含義與 (18) 相同。

早討論這一現象，參看氏著，“Qutluy Bolzun! A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Concept of ‘Fortune’ among the Turks (Part 2),” *Ural-Altaische Jahrbücher* 38 (1966): 13-15；參看 H.-J. Klimkeit, “Manichaean Kingship: Gnosis at Home in the World,” *Nemen* 29 (1982)；此據 M. Heuser and H.-J. Klimkeit, *Studies in Manichaean Literature and Art* (Brill, 1998), pp. 220-222。

¹³⁸ Klimkeit, “Manichaean Kingship,” p. 220.

¹³⁹ 參看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マニ教史の研究〉，頁 182-183；*Die Geschichte des Uigurischen Manichäismus an der Seidenstraße*, pp. 221-222.

¹⁴⁰ Klimkeit, “Manichaean Kingship,” pp. 220-221.

¹⁴¹ 參看 M. Erdal, *A Grammar of Old Turkic* (Leiden: Brill, 2004), pp. 158-159.

十世紀末葉起，大批西州回鶻人開始改宗佛教，佛教取代摩尼教成為國教。¹⁴² 而上述稱號中的變化正發生在這種時代背景之下。在回鶻佛教語境中，用“täjri”表示六趣中天趣內的天神。回鶻佛教徒對於天神的崇拜明顯地體現在回鶻佛經功德主題記中。根據學者對於現存回鶻佛經題記的研究可知，回鶻佛教供養人通常將其功德先回向梵天 (äzrua)、帝釋天 (xormuzta)、四大天王 (tört maxarač) 等天界諸神，以增強諸神神力，求其護佑國家和世人。其後，再將功德依次回向世間的統治者家族、眾生及供養人本人的親族等。¹⁴³ 而在回鶻佛教語境中，“kün täjri” 和 “ay täjri” 也曾出現，但已不再像摩尼教語境中表示具體的神祇，而僅僅指稱日、月。德藏回鶻文寫本*U 9193 回鶻文《金光明經》題記寫於一〇二二年，正好屬於可汗 (7) 在位的時代，第 30-33 行寫道：¹⁴⁴

sansarlıy taloy ügüzüg käcürdäči [ta]r kemisi ol [sä]kiz törlüg ämgäklig öyükdin
üntürdäči [a]m[ra]q [äd]gü öglisi ol biligsiz biliglig qararïyï yoqadturdači
[tarqardači k]ün täjri ol nizvanilig čonmaqïy tarqardači sö[ntürdäč]i ay täjri ol
它是橫渡輪回之江海的船筏；它是引領走出「八苦」的善友；它是消滅、驅
散無知的黑暗的太陽 (kün täjri)；它是熄滅煩惱的火焰的月亮 (ay täjri)。

可知，十一世紀初回鶻佛教語境中的“kün täjri”和“ay täjri”分別指日、月。德藏回鶻文寫本 U 1934 為回鶻文《維摩詰所說經》殘片，譯自該經的漢譯本。殘片背面第 3 行、第 9 行兩次出現“kün täjri”字樣，正好對譯漢字「日」，意指太陽。¹⁴⁵ 回鶻佛教語境中的這種觀念直到十七世紀都沒有變化。現存年代最晚的回鶻文獻——抄寫於一六八八年的回鶻文《金光明經》酒泉文殊溝本的題記部分記有（俄藏 SI M/1, A. N. 1a, 12-13 行）：burxan nomiliy kün täjri üzä alqu buluŋ
yïňaqqlarnïj yarumaqï bolzun「願通過佛法之日（光）使所有的角落和方向發光」。¹⁴⁶

¹⁴² 參看 Moriyasu, “Chronology of West Uighur Buddhism,” pp. 191-193；同作者，〈西ウイグルの仏教クロノロジー〉，氏著，《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頁 645-647。

¹⁴³ 參看 P. Zieme, *Religion und Gesellschaft im Uigurischen Königreich von Qoco: Kolophone und Stifter des alttürkischen buddhistischen Schrifttums aus Zentralasien* (Opladen, 1992), pp. 64-88；漢譯本：桂林、楊富學譯，《佛教與回鶻社會》（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頁 100-119。Kasai, *Die uigurischen buddhistischen Kolophone*, pp. 37-44.

¹⁴⁴ 參看 Kasai, *Die uigurischen buddhistischen Kolophone*, pp. 77-79.

¹⁴⁵ P. Zieme, *Vimalakīrtinirdeśasūtra: Edition alttürkischer Übersetzungen nach Handschrifffragmenten von Berlin und Kyoto* (Brepols, 2000), p. 130.

¹⁴⁶ Kasai, *Die uigurischen buddhistischen Kolophone*, pp. 101-102, 107.

付馬

足見回鶻佛教語境中的“*kün täjri*”始終指太陽，而非某一神明。

在回鶻摩尼教語境中有著重要意義的“*ay täjri*”（月神，即夷數）和“*kün täjri*”（日神，即淨風）在回鶻佛教語境中已然失去了其原有意義。當西州回鶻統治階級及其民眾在十世紀末、十一世紀初改宗佛教之後，其統治者稱號中的「稱號來源」部分應當被重新解讀。筆者認為，在西州回鶻統治者改宗佛教之初，他們繼承了摩尼教時代“*ay/kün täjridä qut bulmīš*”這種「稱號來源」的傳統，但隨著摩尼教話語被佛教話語取代，某位可汗具體是從月神（夷數）處還是從日神（淨風）處獲得王權這種特指的解釋體系也隨之消失。因此，在稱號中區分和單列日、月這兩個因素已經沒有意義，於是出現了日、月並舉的現象。如前所述，在回鶻佛教觀念中，守護俗世王國的最高力量來自天界諸神，日、月對此並無特殊意義。因此，在十一世紀以後，回鶻可汗稱號「稱號來源」部分“*kün ay täjri(lär)dä qut bulmīš*”在佛教話語體系下更應當理解作「從日、月和諸神處獲得福佑」，其重點在「諸神」上。上引元人歐陽玄的記載則可進一步印證這種解釋。他記載的稱號為「諸天敬護護國第四王」(*Täjrilärtä qut bulmīš el tutmīš törtünč xan)，其「稱號來源」部分已經脫落了在佛教語境中並無特殊含義的「日」、「月」，而留下了在佛教語境中最為重要的天界守護諸神「諸天」。歐陽玄記載了畏兀兒人對此稱號的解釋，道：「言諸天敬護者，其國俗素重佛氏。因為梵言以祝之也。」顯然，這種「稱號來源」後來已經有了佛教語境下可以自圓其說的解釋。

表三：回鶻可汗「稱號來源」流變示意表

次序	年代	形式	釋義	來源	解釋體系
1	漠北時代	(<i>uluγ</i>) <i>täjridä qut/üläg bulmīš</i> ¹⁴⁷	「天上得果報」	草原傳統	草原傳統
2	漠北時代	<i>täjridä bolmīš</i>	從天而生的	草原傳統	草原傳統
3	漠北時代 至十一世紀以前	<i>ay täjridä qut bulmīš</i> <i>kün täjridä qut bulmīš</i>	從月神（夷數）處獲得福佑的 從日神（淨風）處獲得福佑的	草原傳統 +摩尼教因素	摩尼教話語

¹⁴⁷ 在目前已知的回鶻可汗稱號中，這種形式出現的時間較2、3為晚，但早在突厥汗國時代，這種形式已被採用。參看 A. Bombaci, “*Qutluγ Bolzun! A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Concept of ‘Fortune’ among the Turks (Part 1)*,” *Ural-Altaische Jahrbücher* 36 (1965): 285-290.

次序	年代	形式	釋義	來源	解釋體系
4	十一至十二世紀	kün ay täŋri(lär)dä qut bulmïš	從日、月和諸神處獲得福佑的	摩尼教傳統 +佛教因素	佛教話語
5	十二世紀後？	*täŋrilärtä qut bulmïš	「諸天敬護」	佛教傳統	佛教話語

(三) 「阿薩蘭」(arslan)：借自同時代中亞突厥人政權的稱號因素

如前所述，在十世紀上半葉已有西州回鶻統治者在稱號中加入「阿薩蘭」(arslan，獅子)這一因素。該因素後來頻繁地出現在西州回鶻統治者的稱號中，他們甚至因此被遼朝稱為「阿薩蘭回鶻」。這種傳統一直延續到十四世紀：在察合台汗國所立畏兀兒亦都護的稱號中，也可見到“arslan”這一因素。¹⁴⁸ 然而，這種稱號因素並非漠北遊牧政權固有之傳統。不但在十世紀以前西州回鶻統治者的稱號中不見其出現，在更早的回鶻汗國時代、甚至突厥汗國時代的統治者稱號中也未嘗得見。¹⁴⁹ 與西州回鶻同時代的甘州回鶻、于闐佛教王國的統治者稱號中也不見有「獅子」這一因素。¹⁵⁰ 獅子並非產於北亞草原地區的動物，也不分佈在東部天山地區。那麼，這一因素如何進入到了西州回鶻統治者的稱號中呢？

種種跡象表明，該因素應當來自位於西州回鶻西方的其他突厥人政權。錢幣和文獻資料顯示，喀喇汗王朝在十一世紀分裂成東、西兩汗國之前一直實行雙王制，汗國東部的大汗即稱「阿薩蘭汗」(Arslan xan，即獅子王)，為汗國最高統治者；西部的小汗稱「博格拉汗」(Buyra xan，即公駝王)。¹⁵¹ 在可汗以下的統治階層的頭銜之前，也都帶有這兩種因素，表示同一頭銜下的階次。¹⁵²《突厥語大詞典》“arslan”詞條記：「此詞被用作諸汗之名。」¹⁵³ 實際上，這種現象早在十

¹⁴⁸ 參看 Rybatzki, “Türk and Uigur rulers in the Old Turkic inscriptions,” p. 255.

¹⁴⁹ 回鶻汗國可汗稱號參看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マニ教史の研究〉，頁 182-183; *Die Geschichte des Uigurischen Manichäismus an der Seidenstraße*, pp. 221-222. 第一、第二突厥汗國可汗稱號參看 Rybatzki, “Türk and Uigur rulers in the Old Turkic inscriptions,” p. 255.

¹⁵⁰ 甘州回鶻可汗稱號參看 Hamilton, *Les ouighours à l'époque des Cinq Dynasties*, pp. 143-144.

¹⁵¹ 參看 M. Biran, “Ilak-khanids,” *Encyclopædia Iranica* XII (2004; <http://www.iranicaonline.org/articles/ilak-khanids>).

¹⁵² O. Pritsak, “Die Karachaniden,” *Der Islam* 31.1 (1955): 23 ; P. Golde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 (Wiesbaden, 1992), p. 215.

¹⁵³ Mahmud al-Kašyari,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vol. 2, ed. and trans. R. Dankoff (Harvard University printing house, 1984), p. 361.

付馬

世紀中葉喀喇汗王朝統治者皈依伊斯蘭教以前就已經出現。在傳世的《蘇拉赫詞典補編》(*Mulhaqat al-Surah*) 中可以輯出喀喇汗王朝時期寫成的文獻《喀什噶爾史》(*Ta'rikh Kashghar*) 的片段，記有王朝首位皈依伊斯蘭教的薩圖克汗的事跡。¹⁵⁴ 薩圖克汗卒於九五五年，他本身已經帶有「博格拉汗」的稱號。其父被稱為巴茲爾阿薩蘭汗，稱號中已帶有「阿薩蘭」。可知喀喇汗王族至遲在巴茲爾汗時代已經稱最高統治者為「阿薩蘭汗」。巴茲爾汗統治的時代大致與西州回鶻首次以「阿薩蘭回鶻」之名出現在史冊中的時代(933年)相仿。而喀喇汗王朝的這種傳統甚至還可能向上追溯到熾俟(*Čigil*)部，因為熾俟部的圖騰正是獅子。¹⁵⁵ 獅子在歷史上的分佈範圍直到河中地區，在伊朗語族的傳統中可見對於獅子的崇尚。西州回鶻政權與獅子分佈的北界抑或伊朗世界均不接壤，而喀喇汗王朝、熾俟等部的勢力範圍正處於西州回鶻與上述兩者之間，獅子崇尚的傳播路徑顯然應是從這些處於中亞西部的突厥人政權流向西州回鶻的。

西州回鶻統治者為何會在十世紀上半葉效法其他突厥人政權，將「獅子」用於統治者稱號呢？此問題的答案應當從西州回鶻當時所處的發展環境中尋找。據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藏回鶻文歷史文獻xj 222-0661.09記載，西州回鶻曾向中亞地區進軍，向西至少攻克怛邏斯(*Talaz*)等地，震動西方的伊斯蘭世界。¹⁵⁶ 此事的年代可被考證在八九三年到十世紀初。¹⁵⁷ 此後，西州回鶻雖然沒有將上述地區納入版圖，但當地操突厥語各部均對西州回鶻保持臣服關係，相關證據見於英藏敦煌文書S. 6551《佛說阿彌陀經講經文》。文書記：「遂得葛祿、藥摩、異貌、達但，競來歸服，爭獻珠寶；獨西乃納駝馬，吐蕃送寶送金；拔悉密則元是家生，黠戛斯則本來奴婢。諸蕃部落，如雀怕鷹，責(側)近州城，如羊見虎，實稱本國，不是虛言。」¹⁵⁸ 張廣達、榮新江二位先生據文書中其他線索已將其年代確定在九三〇

¹⁵⁴ 據華濤漢譯文，參看氏著，〈賈瑪爾·喀爾施和《蘇拉赫詞典補編》（上）〉，《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0(1986): 64-66。

¹⁵⁵ 參看Pritsak, "Die Karachaniden," p. 23.

¹⁵⁶ 內容見文獻第22-31行，參看付馬，〈西州回鶻王國建立初期的對外擴張〉，頁146-147；付馬，《絲綢之路上的西州回鶻王朝——9-13世紀中亞東部歷史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頁118-120。

¹⁵⁷ 付馬，〈西州回鶻王國建立初期的對外擴張〉，頁156, 161；付馬，《絲綢之路上的西州回鶻王朝》，頁133-138。

¹⁵⁸ 參看張廣達、榮新江，〈有關西州回鶻的一篇敦煌漢文文獻——S6551 講經文的歷史學研究〉，《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2: 24。筆者在二位先生錄文的基礎上稍有調整。

年前後。¹⁵⁹ 文書中提到的葛祿（Qarluq，即葛邏祿）、藥摩（Yayma，即樣磨）、異貌（Yemäk，即咽滅）、獨西（Tuxsi）等均是分佈在中亞西部的突厥部族。他們當時要向西州回鶻稱臣納貢，顯然是前述西州回鶻遠征中亞西部的直接影響。在十世紀初期，西州回鶻在中亞突厥諸部中處於主導地位，可能在其征服諸部的過程中接觸到在中亞西部各突厥政權流行的獅子崇拜，將其加入到自身的稱號中，標示其統治者的卓越地位。

（本文於民國一〇七年八月十三日收稿；一〇八年四月十八日通過刊登）

¹⁵⁹ 張廣達、榮新江，〈有關西州回鶻的一篇敦煌漢文文獻〉，頁 27。

付馬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宋濂，《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點校本。
-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點校本。
-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1957，影印本。
- 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點校本。
- 脫脫等，《金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點校本。
- 脫脫等，《遼史》，北京：中華書局，2016，點校本修訂本。
- 歐陽玄撰，陳書良、劉娟校點，《歐陽玄集》，長沙：嶽麓書社，2010。
- al-Kašyari, Mahmud.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vol. 1.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R. Dankoff. Harvard University printing house, 1982.
- al-Kašyari, Mahmud.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vol. 2.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R. Dankoff. Harvard University printing house, 1984.
- Martinez, A. “Gardīzī’s Two Chapters on the Turks.”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2 (1982): 109-217.

二・近人論著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

- 1991 《北庭高昌回鶻佛寺遺址》，瀋陽：遼寧美術出版社。

付馬

- 2013 〈西州回鶻王國建立初期的對外擴張——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藏xj222-0661.09 號回鶻文書的歷史學研究〉，朱玉麒主編，《西域文史》第 8 輯，北京：科學出版社，頁 145-162。
- 2014 〈唐咸通乾符年間的西州回鶻政權——國圖藏 BD11287 號敦煌文書研究〉，《敦煌研究》2014.2：76-81。
- 2018 〈兩種回鶻語《阿離念彌本生經》寫本比較研究——兼論西州回鶻早期的譯經活動〉，《西域研究》2018.3：30-48。
- 2019a 《絲綢之路上的西州回鶻王朝——9-13 世紀中亞東部歷史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2019b 〈宋元之間哈密地區獨立政權的出現——從馬可·波羅對哈密州的記載說起〉，榮新江、党寶海主編，《馬可·波羅與 10-14 世紀的絲綢之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 224-232。

布萊茲須納德著，梁園東譯註

1935 《西遼史》，上海：商務印書館。

成吉思

2013 〈《葛啜墓誌》突厥文銘文的釋讀〉，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 19 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 443-445。

伊斯拉非爾·玉蘇甫、安尼瓦爾·哈斯木

2009 〈新疆博物館館藏古錢幣〉，侯世新主編，《西域歷史文化寶藏探研——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論文集》第 2 輯，烏魯木齊：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

努爾蘭·肯加哈買提

2007 〈日月光金錢胡書考〉，《中國錢幣》2007.1：41-46。

周良霄

1981 〈關於西遼史的幾個問題〉，《中華文史論叢》1981.3：243-257。

林幹

2007 〈河西回鶻可汗世系表〉，氏著，《突厥與回紇史》，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頁 241。

芮跋辭、吳國聖

2013 〈西安新發現唐代葛啜王子古突厥魯尼文墓誌之解讀研究〉，榮新江，《唐研究》第 19 卷，頁 425-442。

党寶海

1998 〈13、14 世紀畏兀兒亦都護世系考〉，《西北民族研究》1998.1：27-35。

耿世民

1981 〈回鶻文《土都木薩里修寺碑》考釋〉，《世界宗教研究》1981.1：304-311。後收入氏著，《維吾爾古代文獻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3，頁 422-432。

2008 《回鶻文哈密本《彌勒會見記》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張廣達、榮新江

1989 〈有關西州回鶻的一篇敦煌漢文文獻——S6551 講經文的歷史學研究〉，《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2：24-36。

陳國燦、伊斯拉非爾·玉蘇甫

2009 〈西州回鶻時期漢文《造佛塔記》初探〉，《歷史研究》2009.1：174-182。

程溯洛

1993 《唐宋回鶻史論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付馬

華濤

- 1986 〈賈瑪爾·喀爾施和《蘇拉赫詞典補編》（上）〉，《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0：60-69。
- 2000a 〈高昌回鶻與契丹的交往〉，《西域研究》2000.1：23-32。
- 2000b 《西域歷史研究——八至十世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黃文弼

- 1954 《吐魯番考古記》，北京：中國科學院。

楊富學

- 2015 〈大唐山市博物館藏《回鶻米副侯墓誌》考釋〉，《民族研究》2015.2：78-86。

榮新江

- 1986 〈歸義軍及其與周邊民族的關係初探〉，《敦煌學輯刊》1986.2：24-44。
- 1996 〈敦煌藏經洞的性質及其封閉原因〉，《敦煌吐魯番研究》2：23-48。
- 2009 〈《西州回鶻某年造佛塔功德記》小考〉，張定京、阿不都熱西提·亞庫甫編，《突厥語文學研究——耿世民教授 80 華誕紀念文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頁 182-190。
- 2013 〈大中十年唐朝遣使冊立回鶻史事新證〉，《敦煌研究》2013.3：128-132。

榮新江、余欣

- 2008 〈沙州歸義軍史事繫年（咸通十四年—中和四年）〉，南華大學敦煌學研究中心編，《敦煌學》第 27 輯，臺北：樂學書局，頁 255-273。

榮新江主編

- 2007 《吐魯番文書總目·歐美收藏卷》，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錢伯泉

- 2015 〈高昌故城和北庭故城發現的回鶻文銅錢研究〉，《古代錢幣與絲綢高峰論壇暨第四屆吐魯番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山田信夫

- 1951 〈九姓回鶻可汗の系譜：漠北時代ウイグル史覺書〉，《東洋學報》33.3/4：90-113。

田阪興道

- 1940 〈回紇に於ける摩尼教迫害運動〉，《東方學報》11.1：223-232。

吉田豐

- 1989 〈ソグド雜錄（II）〉，《オリエント》31.2：165-176。

森安孝夫 (T. Moriyasu)

- 1991 〈ウイグル=マニ教史の研究〉，《大阪大學文學部紀要》31/32。
德譯本：*Die Geschichte des Uigurischen Manichäismus an der Seidenstraße*. Wiesbaden, 2004.

2015 《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社。

Biran, M.

2005 *The Empire of the Qara Khitai in Eurasian History: Between China and the Islamic World*. Cambridge.

2013 “Unearthing the Liao Dynasty’s Relations with the Muslim World: Migrations, Diplomacy, Commerce and Mutual Perceptions.” *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 43: 221-251.

Bombaci, A. (龐巴奇)

1965 “Qutluy Bolzun! A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Concept of ‘Fortune’ among the Turks (Part 1).” *Ural-Altaische Jahrbücher* 36: 284-291.

1966 “Qutluy Bolzun! A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Concept of ‘Fortune’ among the Turks (Part 2).” *Ural-Altaische Jahrbücher* 38: 13-43.

Bregal, Y.

2003 *A Historical Atlas of Central Asia*. Brill.

Clauson, G. (克勞森)

1972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rdal, M.

2004 *A Grammar of Old Turkic*. Leiden: Brill.

Geng, Shimin, and H.-J. Klimkeit

1985 “Zerstörung manichäischer Klöster in Turfan.” *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18: 7-11.

1988 *Das Zusammentreffen mit Maitreya: Die ersten fünf Kapitel der Hami-Version der Maitrisimit*. Wiesbaden.

Golden, P.

1992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 Wiesbaden.

Gulácsi, Z. (古樂慈)

2001 *Manichaean Art in Berlin Collection*. Brepols.

付馬

Hamilton, J. R. (哈密屯)

- 1955 *Les ouighours à l'époque des Cinq Dynasties*. Paris.
1986 *Manuscrits ouïgours du IX^e-X^e siècle de Touen-Houang*. Paris.
1992 “Calendriers manichéens ouïgours de 988, 989, et 1003.” in *Mélanges offerts à Louis Bazin par ses disciples, collègues et amis*, edited by J.-L. Bacqué-Grammont et R. Dor. Paris, pp. 7-23.

Heuser, M., and H.-J. Klimkeit

- 1998 *Studies in Manichaean Literature and Art*. Brill.

Kasai, Y. (笠井幸代)

- 2008 *Die uigurischen buddhistischen Kolophone*. Brepols.

Klimkeit, H.-J. (克林凱特)

- 1982a “Manichaean Kingship: Gnosis at Home in the World.” *Nemen* 29: 17-32.
1982b *Manichaean Art and Calligraphy*. Leiden.

Laut, J.

- 1986 *Der frühe türkische Buddhismus und seine literarischen Denkmäler*. Wiesbaden.

Le Coq, A. v. (勒柯克)

- 1910 *Chuastuanift, ein Sündenbekennen der manichäischen Auditores. Gefunden in Turfan (Chinesisch-Turkistan), Abhandlungen der Preuss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 Anhang 4. Berlin.
1922 *Türkische Manichaica aus Chotscho*, III. Berlin.
1923 *Die buddhistische Spätantike in Mittelasien*, II: *Die Manichaeischen Miniaturen*. Berlin.
1924 *Die Buddhistische Spätantike in Mittelasien*, III: *Die Wandmalereien*. Berlin.

Liu, Yingsheng

- 2001 “A Century of Chinese Research on Islamic Central Asian History in Retrospect.” In “Études karakhanides,” special issue. *Cahiers d'Asie centrale* 9: 115-129.

Moriyasu, T. (森安孝夫)

- 2001 “Uighur Buddhist Stake Inscriptions from Turfan.” *De Dunhuang à Istanbul—Hommage à James Russell Hamilton*. Brepols, pp. 150-223.
2008 “Chronology of West Uighur Buddhism: Re-examination of the Dating of the Wall-paintings in Grünwedel's Cave No.8 (New: No.18), Bezeklik.” *Aspects of Research into Central Asian Buddhism*. Brepols, pp. 191-227.

- Müller, F. W. K.
- 1904 *Handschriften-Reste in Estrangelo-Schrift aus Turfan, Chinesisch-Turkistan, II, Abhandlungen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Anhang 2.* Berlin.
- Pritsak, O.
- 1955 “Die Karachaniden.” *Der Islam* 31.1: 18-68.
- Röhrborn, K.
- 1991 *Die alttürkische Xuanzang-Biographie VII. Nach der Handschrift von Leningrad, Paris und Peking sowie nach dem Transkript von Annemarie von Gabain.* Wiesbaden.
- 1996 *Die alttürkische Xuanzang-Biographie VIII. Nach der Handschrift von Leningrad, Paris und Peking sowie nach dem Transkript von Annemarie von Gabain.* Wiesbaden.
- Rybatzki, V. (芮跋辭)
- 2000 “Türk and Uigur rulers in the Old Turkic inscriptions.”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44.2: 205-292.
- Semet, A.
- 2005 *Lexikalische Untersuchungen zur uigurischen Xuanzang-Biographie.* Wiesbaden.
- Sims-Williams, N., and H. Halén
- 1981 “The Middle Iranian Fragments in Sogdian Script from the Mannerheim Collection.” *Studia Orientalia* 51: 3-11.
- Sundermann, W. (宗德曼)
- 1984 “Probleme der Interpretation manichäisch-sogdischer Briefe.” In *From Hecataeus to al-Huwarizmi: Syriac, Arabic, Chinese, Greek and Latin Sources from the History of Pre-Islamic Central Asia*, edited by J. Harmatta. Budapest, pp. 289-316.
- 1992 “Iranian Manichaean Turfan Texts concerning the Turfan Region.” In *Turfan and Tun-huang the texts*, edited by A. Cadonna. Firenze, pp. 63-84.
- Thierry, F. (蒂埃里)
- 1998 “Les Monnaies de Boquq Qaghan des Ouighours.” *Turcica* 30: 263-278.
- Umemura, H. (梅村坦)
- 1996 “A Qočo Uyghur King Painted in the Buddhist Temple of Beshbaliq.” *Turfan, Khotan und Dunhuang.* Berlin, pp. 361-378.

付馬

Zhang, Tieshan, and P. Zieme

- 2011 “A Memorandum About the King of the On Uygur and his Realm.”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64.2: 129-159.

Zieme, P. (茨默)

- 1992a “Manichäische Kolophone und Könige.” In *Studia Manichaica,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ichaeism, St. Augustin/Bonn, August 6-10, 1989*, edited by G. Wiessner and H.-J. Klimkeit. Wiesbaden, pp. 319-327.
- 1992b *Religion und Gesellschaft im Uigurischen Königreich von Qoco: Kolophone und Stifter des alttürkischen buddhistischen Schrifttums aus Zentralasien*. Opladen. 漢譯本：桂林、楊富學譯，《佛教與回鶻社會》，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 2000 *Vimalakīrtinirdeśasūtra: Edition alttürkischer Übersetzungen nach Handschriftfragmenten von Berlin und Kyoto*. Brepols.
- 2015 “Paul Pelliot and tārim.” *Journal of Sino-Western Communications* 7.2: 247-257.

三・網路資訊

Biran, M.

- 2004 “Ilak-khanids.” *Encyclopædia Iranica* XII. <http://www.iranicaonline.org/articles/ilak-khanids>.

Study of the Official Titles of West Uighur Rulers: Years of Reign, Structures, and Features

Ma Fu

Department of History, Peking University

In mid 9th century, the Uighurs moved westward to areas surrounding the Tian Shan Mountains. There they established the West Uighur kingdom that centered at Xizhou (Qočo) and Beiting (Beşbalıq). Given the scarcity of relevant documents, the history of the West Uighur kingdom to date has largely remained a mystery. Records of its rulers can only be found in scattered remnants.

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research, my article aims to comprehensively survey the titles of West Uighur rulers in various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sources, specifically those having been unearthed since the previous century in Old Turkic and Middle Iranian languages in Turfan and other regions. Their titles are examined and verified, one by one, in light of relevant characteristics and years of reign. Using the above results, the article then attempts to re-construct a chronology of the West Uighur rulers along with an analysis of the structural features of the official titles and their subsequent changes. These titles inherited traditions of the Uighur Steppe Empire, and they included new elements and structural features as well. With Manichaeism being subsequently replaced by Buddhism as the kingdom's primary religi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itles had already undergone changes despite the existence of certain remaining Manichaean elements.

Keywords: West Uighur, Kaghan, title of the rulers